

論國民革命 與共產革命 之別

黃花岡光復網：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頻道：光復之聲

Twitter：[@guangfuwan](https://twitter.com/aguangfuwan)

Facebook：[@huanghuagang](https://www.facebook.com/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https://www.facebook.com/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Twitter：[@revivingROC](https://twitter.com/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https://www.facebook.com/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製作與傳播跟黃花崗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

revivingROC

目录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

[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

[汪精卫：分共以后](#)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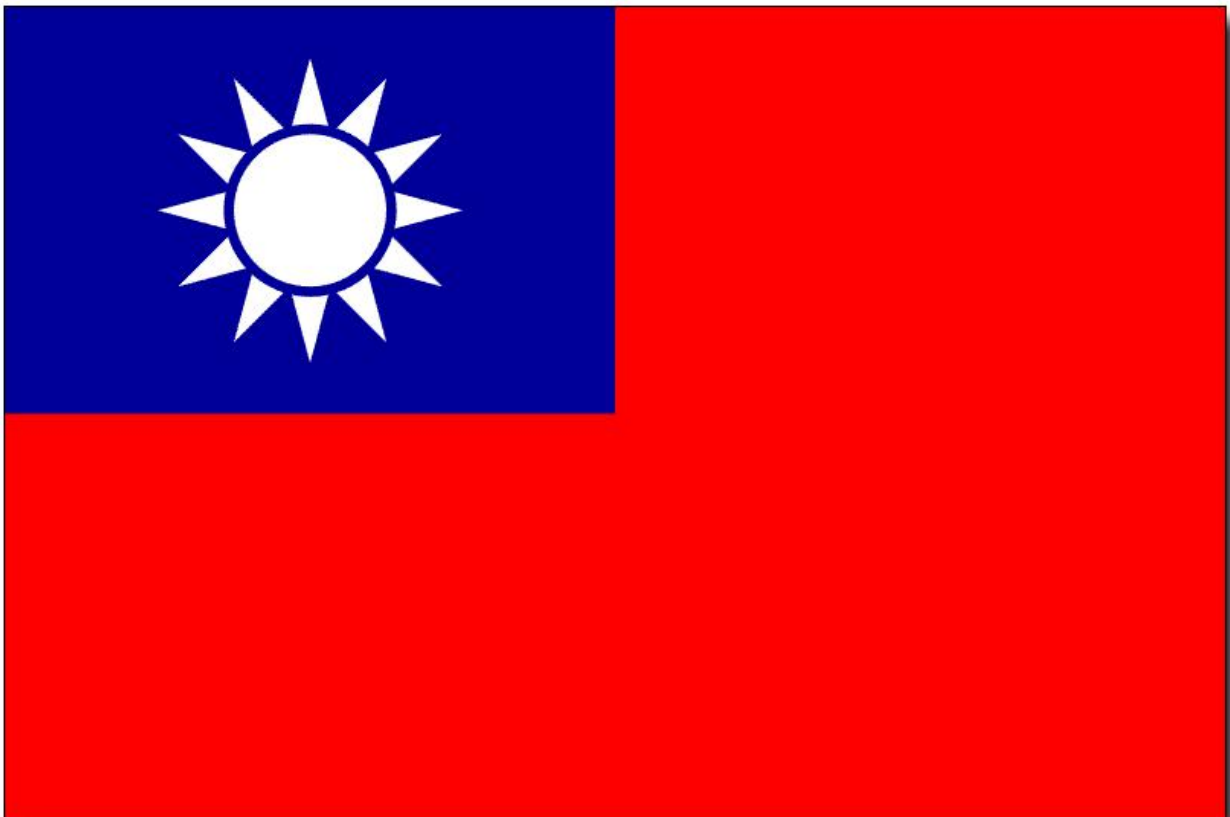
[戴季陶：中国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

[胡汉民：列宁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术](#)

[萨孟武：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之社会革命之比较](#)

[萨孟武：布尔札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潘公展：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

蒋中正

中正与湖南人民睽违久了，今日到这个欢迎大会，与湖南人民握手言欢，心中欣慰，不可以言语形容！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在中华民族国民革命历史中具有无限光荣，这是值得我们佩慰的！今日特就此机会，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向湖南人民一说：湖南人民，受共产党的残杀压迫和剥削，到现在想起来，恐怕还有余怖，回忆十五六年之时，共产党蟠踞湖南的时候，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而且到处肆意没收土地、没收工厂、没收商店，结果使湖南农民，没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没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没有商可经；民生凋敝、社会纷乱，使湖南人民，不仅不能安居求业，而且单纯的生存，也无时无地不在危险状态之中！

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的，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上就不觉盲从。为完成国民革命计，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生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都不能不加以纠正。

总理曾经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



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到结论。这乃是革命的最高原则，一切革命的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进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先把这个问题的性质内容和背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去寻适当的方法，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症看清楚才行，如果病原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这个道理也可以适于革命。

革命要有主义、方法，然而革命的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于乙国，因此至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我们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再研究这两种革命，哪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

先从革命的动机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革命的动机，是起于阶级斗争，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起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



中国两百多年来，受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如水深火热，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者们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厉害，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呼声，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领导人民实行革命，以拯救被压迫的同胞！所以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这是因为他的革命是由于爱。

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致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酷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泯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次就革命的性质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他们的主张，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姑且不论，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牺牲，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们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



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不过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要全民族得到解放，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而且我们认为解放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放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总而言之，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的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无依归，然后可以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也可曰夺取，是其以人不当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面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在别方面，又以政治的办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

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



就是只要是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不问他是属于哪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在革命势力的内部，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集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以充实革命的势力，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至于民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之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革命方法，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三点。

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究竟哪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极力赞成共产党的革命的。我认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或有人诅咒共产党，我必竭力为之辩护。我当时赞成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即此一点，就可证明。就是我决无丝毫反对之意，并且自信出于人类的至诚，决没有丝毫偏私之心，作用于其间。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的环境，不许我离开，所以没有实行。

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我赴难到粤，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我们总理深谈了一夜，总理也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准许我照预定计划前往苏俄、切实联络，后来陈逆虽然窜逃，广州虽然克服，而杨希闵刘镇寰飞扬跋扈、目无



党国。当时革命的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哪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

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是胡汉民和汪精卫两先生所知道的。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可分两时期，从苏俄革命时起，到我赴俄之时止，为第一时期。赴俄之后，到了现在，为第二时期。第一时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感想之所以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现在许多青年，因为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对于共产革命不少盲从，我现在特将本个人经验，说明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理由，至于共产革命，在苏俄是否成功，这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我们不必多说。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既不愿受别人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的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西方民族本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



族，都遭失败，哪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和卑污的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并没有完全成熟的阶级，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

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哪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铁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也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的生活，当然可以增长，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



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总而言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状况，或国际地位说阶级革命，都没有在中国实行的余地，这是苏俄共产党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二点。

最后，从革命的方法研究，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已经说过，那末，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害。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

不待说，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哪里能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判裁来减轻，不待农民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



放农工说，中国现在，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残酷和卑污。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光明的中国民族，前面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述，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立即退出服从三民主义，本党自然加以收容，没有加入的，要随时留意，不要为他们所引诱，如果是执迷不悟，那本党为保障革命计，对于反革命的自当予以最严厉的处分。五月各种国耻纪念日，不久将到了，共产党难免假借这个机会，又来实行煽动，所以一般青年，也不能不注意。打倒帝国主义，是目前革命的唯一目的，是本党的根本政策，所以本党必定领导全国人民向这个目标前进。不过我们要知道，打倒帝国主义，不是徒呼口号所能成功，更非一纸标语所能济事，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为一时的感情所激发，为一时的冲动所驱使，而出于轻躁的行动，以取快一时，不仅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徒然引起革命的障碍，或反增加了帝国主义的许多压迫的力量。

我们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八个字。勾践灭吴也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何况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哪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所以各种国耻纪念的时候，我们应当沉默志哀、痛定思痛，切实作实力的准备，以图最后的决战。游行示威、呼号叫跳，一方面足以引起民众的厌恶，同时也足以使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这实在是最幼稚的行动。一切青年要明白国



民政府，是革命政府，是负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责任的政府，要打倒帝国主义，只有全国一致的拥护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使他能够完成其使命；如果为共产党所欺骗和诱惑而反对本党，破坏国民政府，即便是反对革命，对反革命的自当予以严重的制裁。

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已开始了训政时期，训政时期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在这个时期内，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中央受全党的重托，执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所以我们只知道以全力尽保姆和导师的责任，以全力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中央必以保姆的资格，加以抑制，有不受训练的举动，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加以约束。我们只知应尽的天职，为革命来努力奋斗。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欺骗我们革命青年，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要时刻提防着共产党的诱惑，使我们迷入歧路，重蹈万劫不复的惨境，并望大家毅然加入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

（附注：这篇是蒋主席在长沙时的演讲词）



三民主义之认识

胡汉民

一、三民主义是以博大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进化定律为总枢纽的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是从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先生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看出两个要点：（一）世界历史是依进化的定律而演进的，进化又是以争生存为中心的；（二）由争生存这个中心，分演出各种的进化现象和事实，由进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同民族争，国同国争，国内人民同君主争，劳动家同资本家争的种种现象和事实。这两个要点，站在进化定律的立场看，是一贯的：这是先生的历史观。所以依先生所说：人类在世界进化中争生存，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人同人争，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决。

在人同人争的全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争多得很。举其最著，如君权与神权之争，君主与贵族之争，君主与人民之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之争，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争，国与国之争，民族与民族之争。这许多斗争，并不是在全部历史上分了显明的阶段的。许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时间和空间的制限，把这种种斗争，分做由神权与君权之争，到君权与民权之争，再到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之争的阶段，这是不甚正确的，易引起误解的。孙先生的学力之伟大处，就在于能把这种浅狭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种斗争的联属性，总括地说：“世界自



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在人同人争的全部历史当中，**君权与神权之争**不过是占一极小的部分，推而至于**民权与君权之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之争、民族与民族之争**，也都不过是各占一部分。只拿一种斗争去解释历史，不但不足以尽人同人争的全部，而且会走到和世界进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简单地说，各种斗争，在历史上有时是各别的发生，有时是混同的发生，有时是间断的发生，有时是片段的发生，这都是由一时一地的实际因果关系所决定。但是一时一地的实际因果关系，还不过是各种各别的斗争的枝节因缘而非全部人同人争的总因缘。人同人争的总因缘，就是以争生存为中心的进化定律。

孙先生将历史上各种各别的斗争，归纳为三种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这三种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历史事实，故亦可以括尽人同人争的内容。而且，在历史上，三种革命也没有什么显明的阶段可分。我们只要取十七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一看，就够证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是常常同时并起的**，但是世界的学者都是就一种革命的要求而发为革命的思想。如卢梭天赋人权之说专重民权运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专重无产阶级运动，可为明证。孙先生独能超越于任何一种革命之上，而创立一个崭新博大的三民主义，这是先生最伟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争的历史的行程，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较的各别发动而趋于混同发动，由比较的和缓演进而趋于急激展开，由比较的涉及于少数人而趋于涉及最大多数人。所以先生创造三民主义，就是应合这种历史的行程，而成为一个整个的革命主义。世界上无论哪一派的革命主义，在理论上固没有哪个能如三民主义的完备，在实行上更没有哪个能够跳出三民主义的范围，这就可见三民主义之博大了。



结论：争生存是进化的中心；进化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三民主义是以世界历史的中心为纲领，其范围则为过去现在未来人同人争的革命运动所莫能外。

二、三民主义的连环关系

现在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同时急进化的时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问题，充满了世界历史。从前各国有解决了民族问题的，而没有解决民权民生问题；有解决了民权问题的，而没有解决民生问题。纵有解决了民族问题或民权问题的，而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也是落空。就时间上说，自古以来的世界，是这三大问题递嬗堆积下来至今还未解决的悬案，尤其是到了现在必须一同解决的悬案。

就这三大问题亘古久悬不决一点上看，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决的三大问题看，这就是三民主义的世界；更就三大问题成为整个的连环的隐案看，现在就是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最需要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须保持首尾相顾之关系。换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但同时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时不要失却世界革命的统一性。这个条件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大关键。

能够适合于这个条件，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



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行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适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义为什么最适合于世界革命，还可进一层从三民主义连环关系的本身认识出来。（一）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的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不会变为帝国主义。（二）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的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才不会变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的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要三民主义连环的实现，人同人的斗争能终熄，大同世界就可实现。

结论：世界各国的民族，民权，民生问题有同时解决的需要，是为世界革命的目标；三民主义因其连环的内容和关系，为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

三、以三民主义批评其他主义

三民主义的整个性和连环性，既如上述，我们就可站在它的连环性上面，来简单批评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弱点了。

（一）国家主义，没有世界革命资格，自不必说。固然，在求国家之自由独立一个目的上，它也是要抵抗强权，因此它就可以牵合到民族主义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义全体，尤其不是整个的和连环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全体，而况事实上发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种国家主义，就成了帝国主义的代



所以国家主义，一行到国际上头去，就发生毛病，即近代谈国际主义者也要反对，何况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最终目的是做到世界主义的，还能够不反对它么？于此我们就可以说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至于在走偏到帝国主义一条路上去的一点上，国家主义简直要变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了。

（二）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的为无治，为大同，与三民主义目的完全一样；但其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实现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愿望，却无世界革命的方法与行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博大，与无政府主义有同一之目的，其方法则为无政府主义之所无。因为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由**权与能之分开**，由**打破强权就可达到平权**，由**平权就可达到无权**，**无权就是无治**。再加上三民主义之**连环的实现**，**民族由平等而至无争**，**民生由平等而至无阶级无贫富**，这岂不是世界归于大同了么？到了这一步，文化一定极优美，道德一定极高尚。所以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民权主义的理想，民权主义才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行。

（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几年被俄国和第三国际采用得来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时的旧骨董。但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论，其最大弱点有二：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够。不新不够，所以就没有成绩。何以不新呢？马克思的主义，是就七十年前的欧洲经济现象所下的结论，不是就世界进化现象全部所下的结论，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适用的。何以不够呢？马克思处处不肯失去其科学方法，这是他的好处，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学方法，就证明其为不够。因为



他的科学方法，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经济生活演进的一段，这是时间的限制；研究的范围，只是欧洲一二国的经济材料，这是空间的限制。马克思充其量不过是世界革命的学者之一，他的主义哪能比得上包罗全部历史事实和应合世界进化定律的三民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够的第一证明。

马克思的第二国际之秘奥，全在拿阶级斗争的纵的结合，去冲破民族斗争的横的结合，所以他的口号是“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欧战时，第二国际更倡“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但第二国际统辖下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大多数都为赞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节，第二国际即因以瓦解。这可证马克思一派人不~~懂~~民族主义的失败。俄国革命，祖述马克思，但是同时列宁就于马克思“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之外，加了一个“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的本意，在以阶级的革命为主，而利用东方民族革命为辅。这是列宁比马克思懂民族主义的地方，而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国际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天，还是为此。列宁在阶级斗争之外，加用一点民族主义，本来已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派~~人~~却辩护说，这不过是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义，正足证明他们非承认民族主义的事实不可。

由马克思和列宁两派的经验，便得两个教训：**第一，欧洲阶级革命便不行；第二，东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国现在的列宁主义者还没有觉悟，还没有领悟这个教训。因为第三国际还想借帝国主义的本身和对象以统治东方各民族革命；这正足证明其还没有认识民族性之全部重要意义。总括的说，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义，致有第二国际之失败；列宁懂了一点，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现在第三国际由



不懂民族主义而至于伤害东方的民族性，其错误必与马克思同，其不足为世界革命的基础不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够的第二证明。

最后，**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是不愿要民权主义的，因为它所要的是无产阶级独裁。**民权主义的本意是自由平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场看，是没有丝毫恶意的。但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腊的民主和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拿来攻击民权主义的材料，并且以此就来衬出独裁是真的、民主是虚伪的。这一点我们暂且退一步承认，但是马克思派又不肯老实说独裁是真的，还要拿“民主集权”、“以阶级独裁消灭阶级”一类的话来做掩饰，这岂不是承认民权主义是政治的极则么？再就他们解释阶级独裁的内容而论，说老实话，就是**求一个阶级的民主而压迫其他民主**，还不是承认了民权主义么？马克思派一方面攻击民权主义为虚伪，一方面又承认民权主义的需要；是一个大矛盾点；一方面承认民权主义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权主义的一小部分，是一个大弱点。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权主义的全部，便不足以领导世界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够的第三个证明。

由此三个证明，我们更下一个总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在基本理论上不懂民族主义和不要民权主义，是规了不够做世界革命基础的幼稚病；在实际活动上却只接受了一点点民族主义和一点点民权主义，故其结果，最多不过做到一个国家主义的帝国主义，哪能配谈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彻底，便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都不行。何况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定下的结论，是七十年前就一时一隅的经济现象所定的，已是陈腐不适用，怎能用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的呢？



孙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这句话正因先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所指向的目的。不懂三民主义且不懂共产主义的人，把先生这句话当做共产主义的护身符，实属大错。要晓得凡是讲世界革命的人，最终目的**一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关系重大了**。谁的理论和方法证明是行得通的，谁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谁的理论和方法证明是行不通的，谁就是不革命者，甚且谁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孙先生“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一语，实不啻把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打倒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了，而一般人还想拿先生此语作护符，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丑态！

结论：国家主义，在求民族之自由独立上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实上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其病在偏为民族主义之下的右派。无政府主义，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无权无争的理想上为民权主义的左派，而其病在于无实行的方法。共产主义，在阶级革命和阶级独裁的理论与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认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于世界革命为需要的全部意义上，其病在不彻底，强暴行之，且有自趋于反革命一途的危险倾向。

四、总 结 论

从以上简括的说明，我们更作一个总结论，就是：人类以争生存为中心，而争生存就是世界进化的中心。从世界进化的行程。自古以来就生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



大问题。革命者的唯一任务，即在于了解此三大问题之所从出，依其需要解决的企望，和客观的实际所具备的条件，定出一完备的革命主义，以求全部彻底的解决。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即本此义而创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适用性，古今中外实无伦比。马克思主义，固不失为一种富有革命性的学说，然受时间和空间的制限，未能了解历史的真正重心，遂失其领导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纠正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观念之错误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国学者威廉氏，即其一人，但其短处在昧于世界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不知世界进化实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趋势，故其学说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评。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则兼具两派学说之长，而无其短。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伟大，学力之伟大，魄力之伟大，革命性之伟大。

许多人以为现在只管国民革命，等到国民革命的结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产主义也好，三民主义也好，横竖管不到的，何不等后来人去争个解决？说这种话的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懂得为什么有革命的需要，没有懂得革命为什么要主义，更没有懂得我们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所以他就根本上把国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这哪里是忠实的革命者？哪里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哪里是孙总理的信徒？我们是中国国民党党员，都应该了解总理的历史观和进化观，都应该了解总理的主义之出发点和开展线，然后才能了解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才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须为三民主义的革命。凡我同志，当急起注意。



分共以后

汪精卫

上回说的，是武汉分共之经过。党内分共，武汉为最难，亦为最迟。及至最难的部分，已得到最后的解决，分共便成为党内一致的主张了。如今所要说的，是分共以后，要怎么样？

兄弟在此，想提出几个要点。

第一，我们要继续肃清中国共产党。所谓分共，是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后，便怎么样呢？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宣言，都有同样的语调，即是一面攻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一面仍主张不要退出国民党。这显然是借着国民党的掩护，以破坏国民党。恰如要将国民党做鸡蛋壳，而他却要做鸡蛋壳里头未转化出来的鸡雏，平时借着鸡蛋壳的掩护，时候到了，即破蛋壳而出。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只好说是妄想。他为要实现这妄想，已经定下种种计划。

综合几个月来，莫斯科所发表的议论，以及中国以内所得到的报告材料，他的计划，大概是：以蒙古为根据，向北方各省，逐步进取。他只为国民党在北方各省的势力，比较微弱些，可以为所欲为。至于南方各省，无论什么运动，都有国民党做他的对头，所以他必以破坏国民党为第一着。其破坏方法，除在国民党外实



行种种扰乱，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国民党内，做种种挑拨离间的工作。他以为国民党分裂之后，创痕是一时不能即合的，借此机会，使国民党自相残杀，不难使之同归于尽。如此说来，现时所谓分共，只能说是国民党已经确定的主张，而不能说此主张已经完全做到。如今担负国民革命之责任，是国民党，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便是破坏国民革命。不但国民党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中国国民，也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

第二，我们要重新整理国民革命的理论。**我们所谓分共，不但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尤其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国民党自施行容共政策以来，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名义之下，向农工商学各团体，宣传了不少共产党的理论。如今共产党分子，虽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论，仍然存在于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农工商学各团体，仓卒之间，不能分别出哪些是国民党的理论，哪些是共产党的理论，这已是极大的危险。而尤其危险的，是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头，有些热心的人，本来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而误认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的理论，且以为是国民党里头最革命的理论。这种的人，说他是共产党，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论，却与共产党一般无异。这种的人，在农工商学各团体里遇见了不少。

所以国民党当前最急的工作，是将数年以来，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整理一遍。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明明白白，指示给农工商学各团体，这些是共产党的理论，必须抛弃，这些是国民党的理论，合乎国民革命的需要。然后农工商学各团体，方不致迷了方向。这不但是国民党当采



的手段，而且是国民党当尽的义务。不然，只将共产党分子分出去，而共产党理论，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至于整理的方法，当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义为度量衡。凡理论之合于三民主义者则留，不合于三民主义者则去，不能有丝毫苟且假借。举例来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信条。而民生主义里，却已将阶级斗争的理论，批评得清楚。人类因有阶级，才有斗争，这是事实，无论何人，不能无视的。如其要消灭斗争，必先去消灭阶级，阶级消灭，则人类致于平等，进于大同，自然用不着斗争了。这一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总理说，“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然共产主义，是要无产阶级，用斗争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阶级，即有时贪图联合战线的便利，与农民同盟，甚至与小资产阶级同盟，都不过一时的使利，不是永久的结合。所以各阶级间之互相残杀，是必然的现象。而凡这些现象，是有意做成，并非是出于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义，则是用思患豫防的方法，使阶级之未发生的，从此停止，已发生的，也逐渐消融，以引而致之于自由平等之域，所谓事半功倍。所以总理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国家，因为经济落后，大工业没有发达，没有什么大资本，没有什么大商业，所以社会阶级，是不甚悬绝的。而且就全社会看来，最大的压迫阶级，是帝国主义，而全社会皆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所以中国今日所需要的，只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社会间各种力量，应该分功合作，以达此目的。提



出阶级斗争，使社会间自相残杀，于民族联合，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国现在的情形来说，已是如此。照民生主义之最终目的来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达到民生主义之最终目的，也不当采用阶级斗争之方法，而当采用联合社会间各种力量的方法。

如今举几件实事，来做证明。

先就农民运动来说，自去年北伐以来，共产党在两湖做农民运动，其唯一口号，是没收土地。所以创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种种名词。其结果大中小地主一齐打倒，农民一无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们还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来做护符。须知道**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民生主义第三讲里，说得明白，是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的。**并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把耕者有其田的意义，更解说得详细。**共产党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来没收土地，并且由下级机关，自行没收，不经过政府。这种做法，正是民生主义所痛恨的。**我们分共之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明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之理论与方法，和国民党的，全然不同。

共产党之农民政策，所谓没收土地，不过说得好听。其实农民不但没受其益，反受其害。因为他只图**唆使农民打倒乡村间其他一切阶级，其结果社会连锁为之打破，农民亦无以自全。**他却正好利用这些失耕农民的骚动，以为其获取政权的凭借，这真是农民之**蠹贼**！至于国民党之农民政策，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的，虽似乎卑无高论，却适合于农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农民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更为非常密切。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农民说：农民所患的，不是没有土地么？然而中国有些地方，土旷人稀，农民不愁没有土地，却愁有地不能种。

近年以来，所谓华北旱灾，深知原因的，知道不仅是于天旱，却是由于有地不能种。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体手足，便可劳动，以得工钱。农民单是劳动，还不足的，劳动之外，还要本钱。买牛，买耕具，买种子，都是非有本钱不行的。农民何处得本钱呢？是由于借贷。乡村间的高利贷，说起来，骇人听闻的。农民从高利贷得到本钱，幸而哪年无水旱之灾，得以丰收，租税之外，得以还债及供衣食；不幸而哪年有水旱之灾，贴了本钱不算，还要卖儿卖女，以纳租税，及还债呢。这便是有田而不能种之一原因了。

所以农民问题，不是有了土地便得，还须计及本钱。各处设农民银行，以轻微利息，借给农民，资其耕作，才可以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农民银行，谈何容易？不是国家财政充裕，社会经济舒展，何能办到？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但当着眼于农民本身，而当兼着眼于社会连锁关系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钱，似乎可以耕作无忧了。然而还是不够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劫，不但禾稼被其蹂躏，鸡狗被其杀戮，田庐被其焚掠，有时连儿女也被其掳去勒索，再遇着不良军队，真所谓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但当着眼于社会相互经济关系，而当兼着眼于政治了。



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农民似乎可以安居乐业了。然而还是不够的。出口的是农产品；入口的是工业制造品。农民辛苦种出来的豆子，被外国人用低廉的价，买了出口，再用机器，榨成豆油等等，运之入口。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棉花，被外国人用低廉的价，买了出口，再用机器织成棉布，运之入口。其价值相去，不此倍蓰。诸如此类，数之不尽。农民将一滴滴的汗换得来的金钱，以为可以放在手里，不知其结果是加倍蓰赔了出去。几十处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几十个创口，有限的膏血，从几十个创口里，日夜流出，无论如何强壮的人，也要病倒的，何况著名的远东病夫呢。

不平等条约，片面义务的关税制度，如果不能废除，全国势必沦于破产，农民自然不能幸免的。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但当着眼于政治关系，而当兼着眼于国际现状了。以上所说，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外交关系，和农民本身，密切连带如此。可见得国民革命的三个口号，（一）农工商学联合起来，（二）打倒军阀，（三）打倒帝国主义，正是农民运动所必需的。这三个口号，为国民革命计，亦即为农民计。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实实在在，是为农民谋利益的。经此一番解释，农民定必恍然大悟。再不去上共产党阶级斗争的老当，而明白承认民族联合共同致力国民革命，为农民解放运动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运动来说，共产党叫得最响的，无非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独裁为目的，要做成无产阶级的国家。但考之实际，何尝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几个无产阶级领袖的国家便了。几个领袖，各自以一般无产阶级做背景，来夺取政权。一般无产阶级，不过做他夺取政权之牺牲，其他阶级，更不用说。



今年五月间，汉阳县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擅自议决，没收汉阳十五间工厂，组织工人管理委员会。须知道工人管理工厂，是共产党已经试验过失败的事情。俄国十月革命之初，曾经干过工人管理工厂，不多几时，原料缺乏了，工资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势见绌，不能维持下去，赶快由国家收回管理。意大利当大战以后，曾有一两处演过工人管理工厂的喜剧，当其占领工厂之始，竖起红旗，唱国际歌，十分高兴，不多几时，原料工资燃料都无着落，无可奈何，及去请求政府替他向资本家调停，于是慕索里尼窥见弱点，乘之而起，棒喝团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这两件失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岂有不知道的。何以还想在湖北从新搬演？哼，你以为这是他的愚呆么？其实正是他的狠毒。

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厂，其势不能维持。一面以要求国家管理，挟制国民政府，暴露其弱点。一面利用工人失业之众多，做成社会的恐怖，经济的混乱，得所凭借，以夺取政权。他只图以共产党替代国民党，操纵国民革命，工人的死活，哪里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与其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之友，不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之敌。至于国民党之工人政策，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虽也卑无高论，却适合于工人目前之需要。而且工人之解放，与国民革命，息息相关，也和农民一样。国民革命，不专为工人谋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于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才得到真正之保障。国民党戮力于国民革命，即是戮力于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国民党之主义与政策，必不再信共产党什么无产阶级独裁骗人的话，而诚心诚意，加入国民党，以努力于国民革命。



再就商民运动来说，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国民党的口号是“节制资本”，两个口号截然不同。共产党还利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名词，今日说打倒这个，明日说联合那个，九月中旬，我到上海，闻得人说，南京清党的时候，捉着一个当铺的老板，说是共产党，这固然是奇闻。五月中旬，在汉口，闻得咸宁县党部的宣传，有五十块钱以上的，便是小资产阶级。我想田舍间养一只耕牛，价值往往在五十块以上，然则一只耕牛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了。我因此联想到布哈林说过，“我们对于联合富农，其意味等于养取肥牛，榨取牛奶。”所以共产党说联合小资产阶级，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么联合，不过打倒的代名词便了。

至于国民党之节制资本政策，在建国方略里，说得最为明白。“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所尤须辅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所以打倒资本的口号，实与国民党政策，大相违背，容共时代，有些党员，随着共产党的口吻，高叫打倒资本，实是大上其当。分共以后，按照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切实宣传。并时时注意于改善店员与店东之关系，工人与厂主之关系，调和适当，则一般商民和实业家没有不欢迎国民党的。

再就学生运动来说，五六月间，我闻得湖北省党部青年部的宣传，有所谓“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时不信，以为断没有如此荒谬的人，说



如此荒谬的话，后来问顾孟余同志，始知确有其事，真是可恶之极了。不读书的仍然好叫做学生，犹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农民，不做买卖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真是名实不符之至。他还说道，“打倒智识阶级！”社会譬如人身，劳动阶级，要打倒智识阶级，譬如两只劳动的手，要打倒一个储智识的脑，何愁不打倒，只怕同归于尽便了。如果想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必须有自由平等独立之文化。这个责任全在学生身上，**学生不去求智识，是自暴自弃其责任。而所谓打倒智识阶级，是逼人自暴自弃其责任，这真真是亡国灭种之罪人了。**孙文学说，谆谆告人以知难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决没有如此灭裂鲁莽的理论的。

以上噜噜苏苏的，说了一大段，是说明对于民众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截然不同。分共以后，第一要要义，是将共产党的理论，从国民党理论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声声，不要民众，凡有接近民众的，几乎就要疑心他共产党，这种荒谬心理，固然可恨可怜。但是接近民众的时候，如果不将国民党的理论，认识清楚，随手检起一些时髦书籍，便根据宣传，也是莫大的危险的。

第三，中国国民党第一紧要的口号，是“建设起来”。**我们的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国共产党，这些诚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后，可怎样呢？自从北伐以来，我们已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不久便要打倒了张作霖，我们已收回了汉口九江英国的租界，我们已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以外，这些工作，在国民革命史上，诚然有相当价值的。但这些都是消极的



工作，不是积极的工作。只能在国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碍。还没有将国民革命的目的，实现出来，所以今日，我们第一紧要的任务，是将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实现出来。即使一时力不从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纲，不可不求其实现。

今日国民之望治，真真如饥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饮了。孟子说得好，“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又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真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乱思治的心理。我们不要性命的去做国民革命，如能为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获得一点点的幸福，我们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们如真能建设起来，则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前做过的，不为徒劳，以后做去，当更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反为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做机会了。

以上所说三点，都是分共以后，必要的工作，随便说来，期与诸同志努力做去。



今后之中国国民党

何应钦

长江甫定，北伐垂成，全世界人类的目光，正注视于我国国民革命，以为得中国国民党之领导，当能于最短期间，使其完成。不意共产党徒乘机窃发，盘踞要津，听命客卿，肆行捣乱，欲将我中华民族解放之一线生机，从此葬送！赖我忠实同志之努力，举国民众之同情，得以非常处置，将诺大危机，消灭下去，这不仅是中国国民党之幸，实中国国民革命之幸，中华民族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幸！

惟偶有一二国民党员或民众，迷于革命势力集中说，当其言谈时，亦未尝不以共产党员之举动为非是，然而彼等不顾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事实上能否再行合作，每喟然叹曰：“这种似乎分散了革命势力，殊觉不当！”又有一二思想单纯的人们，偶见此次清党之迹象，稍涉于实力的帮助，遂抹煞一切，谓不应该如此！更有一二中了共产党员宣传流毒的，虽明知苏维埃不能因为我们而变更了他们预定的计划，但他们尚忿然作色曰：“左派左派，何处有左派，寤寐以求之。”

这些少数之狐疑，本不足以供研讨，惟抱杞忧的先生们，总以今后的中国国民党，关于革命的方法上，实有注意之必要；加以两湖的共产分子，仍竭力煽惑，意图淆乱党员及民众之观听，以达其利用之目的，故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事实上有意注意之可能。再就本党全体忠实同志说，前此因共产党员之把持操纵，使若于忠实同志亦备遭排斥，因共产党员挑拨离间，使党内常起无聊的纠纷，今共产党员既去，上述两种障碍，不再发生，对于本党之将来，实具无穷之希望！故今后之中



国国民党如何，不特为一般狐疑者暨反对者所重视，即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亦十分加以重视！

本来，中国国民党此次清党运动，实具有重大意义，为世界政党史所无的。因为党内有党，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友党的，就是破坏中国国民党的健者，中国国民党焉得不日就危亡，几致覆灭！其实两党纵因革命的条件适合，有共同奋斗之必要，则各张明旗帜，相互联合，亦未尝不可；今乃以中国国民党为外壳，于其内运用党团，以操纵之，使中国国民党事实上仅为他人一种工具，而丧失其真正面目，致民众末由彻底认识，以阻碍中国国民党之活泼进行，此个特殊现象，实为今日以前政党史所未有的！故此次清党运动，自应占政党史的特殊地位，而具有一种党内不许有党的重大意义，以昭示于现在及未来的一切政党。在具有这样重大意义运动之下，中国国民党居然能自加振拔，得到了相当的胜利，那末，我们党的未来情形若何，即使没有重视之可能，我们亦应于此运动稍事结束后，作一个讲评，审查我们之优劣，对方之得失，以决定今后之新生命。

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何致任彼等在后方捣乱而无一适当之纪律以制裁？这无庸讳言，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组织纪律宣传，有逊于共产党。因为现行的组织，虽然比较进步，然而以区分部为单位，有时仍觉过大；且主持党务者，当派人组织下级党部时，少注意于人选问题，或不依照组织做去，擅自分化区分部，以为其选举竞争的工具。或者党部纵然成立，而少数同志等又始终不



按时开会，或竟不开会，即开会时，而同志又每每不出席，纵然出席，而又视作敷衍的事体，静默不言。因此，接受党的训练甚少，对于实际工作，遂未由参加，偶一参加，亦不能将党的力量运用上去。

平日复少读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籍，及一切党的宣传品，所以有的入党已久，关于党的性质意义精神暨主义政策等，尚未能认识。这些浪漫现象，以视共产党之随处有小组，随时随地开会，而开会均能出席，二次不到者除名，对于个人的自由，绝对牺牲，对于该党的命令，绝对服从者，真不能不有愧色！真不能不相当认为共产党之长处！以上所述，我以为今后每个同志，均应时刻猛省：我们有没有以上的弱点？若有，应该力疾革去！若无，我们又进一步问，有没有共产党的优点？更可进数步问，有没有比共产党更优之点？总之，处处注意，处处改良，放胆去做，失败就是成功之母，千万不要畏怯。若果我们同志连这些事都不改良，则本党之基础，仍是难经风雨的！

所以今后中国国民党如何，其责任仍在我们每个党员身上。想各同志受了这次重大教训，不致毫无刺激罢！

其次，本党训练党员事宜，不加重视，普通一般党员，多只徒挂虚名，不仅昧于主义之认识，即最浅鲜的政治常识亦未具！这种弊端，诚然由于国民党员之不努力，而共产党员之积极把持各级党部而不负责任者，实尸其咎！因为他们正欲利用此粗浅心理，以便宣传其似是而非的三民主义，而吸收本党的努力份子。至于本党势力所及的言论机关，亦多被共产党员操纵把持，致本党无一中心言论，以



指导党员的意志及方法，偶有热心同志，勉强出一刊物，或因经费困难，咸起咸灭，或因环境压迫，忧谗畏讥，未能造成有力的言论。

因此，我党同志，直接间接对于主义之训练极少，共产党员复暗示三民主义之怀疑，于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遂演成今日的现象。要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各种现象及诸家学说多所包举，正适合环境与时代之需求，为最革命最进步的主义，较共产主义为优。**李石曾同志并谓三民主义之民生革命，为“第四层序”的革命，以马克思之苏俄革命，属于“第三层序”，亦可概见一斑。此次本党清党以后，信仰已趋纯洁，关于党员的训练，党的中心言论机关，均已逐渐设施，本党同志，正有充分时间与精力，作主义之研究。我料将来不特任何同志，均能笃信三民主义而无疑，并任何同志均能根据三民主义以批评或指出其他主义之短，大家在共同信仰之下，坚固团结起来！

复次，本党同志还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就是大都抱升官发财的思想，不作实际工作，尤其不肯作实际的下层工作。固然共产党把持了下层工作，以隔断本党与农工之联络，使我辈同志，无由努力，但亦我辈同志之放弃责任者居多。至于抱升官发财观念，则纯属于个人之心理，非严厉革弃，难望其效忠革命！现在因国民革命军势力，渐及黄河流域，克复之省分既广，而升官发财之机会亦多，本党同志若不决定意思，鲜不被环境腐化下去！所以此时实一紧要关头，就是个人革命与不革命之区分，就是本党发育与否关键。



我们每忆及民国元二年党人之腐败，致党丧亡的情形，真令人不寒而栗！惟此次清党所受的教训，不可谓不大，各同志或不致蹈民元二年党人之覆辙，而兢兢业业努力于下层工作罢！现在我人更须注意者，即严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一切投机份子之混入本党，因为此等反动份子之加入，至少有四种害处：一，失却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心；二，使本党其他党员，不知不觉受其恶化；三，容易散革命的战线；四，减弱革命的力量。所以今后本党吸收党员，应加倍严格，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精。否则，共产党员虽去，而反动份子加入，中国国民党仍无振作之希望。

中国有几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多难适以兴国”，我们中国国民党所处的环境，如帝国主义，如军阀，如一切反动分子，如中国共产党，真可说是“外患”、“多难”了。我们现在只都一一将其战胜，并且因为如此，反使我们党员，日愈团结，我们信仰，使之统一，我们行动，勇猛推进，这实在是一种良好现象，所以今后的中国国民党，实值得我们热烈的希望和庆祝！不过我们同志，勿以清党运动已告结束，便谓无患无难，从此不加奋斗！应认识此次要清党，是我们一种大痛苦，一种大教训，一种大改革，努力的向革命方面推进。

上面审查所得，我们的优劣，对方之得失，已昭告于我人之前，则我们此次清党运动之所成功，实因对方的羽毛尚未丰满，且当举国望治情殷之时，故能迅速达到目的，否则尚不知若何繁难，我们每个党员。不宜以此自骄，宜保存我们的优点，除去我们的弱点，采取对方的长处，警惕对方之短处，今后之中国国民党，方能健全的巩固的存在。中国国民党奉行之三民主义，方能迅速的完满的实现，



不然，前途仍是很危险的！若果这样好的机会，我们还听其放弃，不乘时努力奋斗，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罪人，直是全中国民族的罪人！

十六，五，廿四，于镇江军次。

中国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

戴季陶

这一次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国民党的心，这才回来了。党国的情形，已经危急到了十二万分。现在一般忠实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国民党的统一独立的基础，此时救党救国的路，已经明白表现出来，就是国民党人自己恢复自己的自信力和团结力，心口如一地组织起来，中国才有一线的生路。如果不然，国民党一亡，中国就是落在奉鲁军阀的手里，而使全国陷于黑暗。自从改组以来，国民党内的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在有了两个中心，而大多数的党员，迷惑在二心之间，无所适从。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我所以大胆的冒大险，犯大难，要求国民党的同志，很纯粹地集中在先生的思想和主张的下面，同时劝告在共产党的青年，不要为了迷信一个唯物史观，打破国民革命，就是明明白白看见后来的悲惨。不晓得为甚么当时全党的同志，都是迷惑不醒，两年以来，不知不识间，把全国多数有为的青年，赶着向共产党去，二次大会以后，我的自信力，被全党的空气和一个组织与纪律的空名，压伏到不能再起。

(中略)

此时如果国民党的人，仍旧不能够把主义的自信力恢复起来，确实相信地，集中在总理的思想主义的下面，确立起纪纲来，做纪律和组织的基础，不但是党无可



救；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都无可救。此后的中国，连一点恢复的余地都没有。硬把毫无教育，毫无实力，毫无组织的中国人，送了去做帝国主义国际，和共产主义国际大战的战场。无论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如何，中国民族要损失几千万的人口，黑暗几十年，还够不上造成俄国今天这样一个假名共产党的状态。因为中国，连俄国这样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的能力都没有。本来把共产党员，统率在国民党的当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的两大工作，这是总理所取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总理逝世以后，在事实上，成了国民党的痛肿，今天已经切开了。此后的道路，我们很可以看得到，我们要以三民主义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国民革命；不要把没有教养和组织力的中国民族，眼睁睁地送给两个赤白国际来作决战的试验品。国民党只有一致的团结起来，以纯粹的国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两件大事。

中国需要的建设，是要工业先进国援助，德国的科学和美国的机器，才是建设中国的真正材料。同时我们要明白，中国人把中国的改造完成起来，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

中国人今天不能在中国之外去寻世界，要在中国之外去寻世界，就是一种妄想。自己的国家建设不起，民族振兴不起，是没有说世界革命的余地的。这两年来，本党当中把世界革命拿来做成主要口号之殿，对于党内不能唱高调的人，便极力压迫。不错，这也是一条路的。但是这一条路，就算是成功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达到完全打倒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中国人就要作二十年的无代价的牺牲。这是先自己造成战后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然后才来造



俄国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了功，还是只有用德国的科学，和美国的资本来做建设。这几十年的岁月，几千万人的牺牲，只算是做了第三国际的试验品，为甚么今天不直截了当的，一面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同时教民众作卧薪尝胆忍辱负痛的工作，使中国的生机，在平和中培养起来，把中国过多的人口移向中国的四围，如蒙古西藏新疆川边等地方去生息，而把他们逼向战争的一条路去呢？

战争本不定是罪恶，但是也还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话。现在中国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国际战争，照总理建国方略所说的利用世界的资本和技能，先造成物质的建设，然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出，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础。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前次广东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只跟着第三国际的压迫，同时使中国柔弱的国民，终久为救国爱国不得不走战争的路，这样的方法，直是先求民死，再说民生，将来生否不可知，而眼前就是驱民于死地。我们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唤起世界民众的同情，和中国国民的觉悟和组织，不是马上要制造国际战争。但是照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的作法，两三年内，就可以造出国际战争来，无智识、无组织、无训练、无交通制造设备的中国国民，岂不是悲惨到了极点了么？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平等，为民众求解放的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决不应该如此的。

所以总理说，要确立起民族的自信力，使民族主义成了功，然后才可以讲世界主义。这两年来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在东方所逼成的战争机运，已经进行到相当程度。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的目标，如果很明白地在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国际战争是决定非避免不可。然而这两年国民党对于国民，不确实地苦教国民作卧薪尝



胆的工作，只是教国民作破釜沉舟的运动，这一个方针，和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的目的，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们要记得总理北上那一年对国民说：“我们要国民会议实现，只要国民的意思集中，要国民的意思发表，十万个电报，胜过军阀十万的大兵。”我们已经很明白他看出来，如果中国国民党不是纯粹的三民主义的党，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来组织这一个国际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场大的国际战争不休，这不单是国民党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简直是替中国国家造棺材。

两年以来，我们无论如何想，总想不出国民党有一条生路可走。就是为此，现在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作救国的革命呢？作亡国的革命呢？先亡了国再做革命，这是共产党的策略；先教民死，再作共产的企图，这是共产党的策略；先牺牲了中国国家的存在，和民众的生存，去巩固第三国际的基础，再图世界革命的成功，这是共产党的策略；但是中国的国民，中国革命党是不应该如此的。再说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要学土耳其的方法，目前是做不到的，我们中国的国民，没有土耳其国民对于战争的素养，没有像土耳其在欧战当中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新式战备，土耳其之陷于灭亡，是欧战的结果，同时克马耳的以战争复兴土国，也是欧战的结果，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在今天不能不时时有对帝国主义决死的心；而不能不努力做忍辱负重的预备工作。

一个国民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意识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国民的自信。中国的国民，不要图存在发展则已，要图存在发展，只有很坚确地信仰中国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个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我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的理论，



在世界革命的理论当中，他是后来居上，他的伟大和崇高，确实在马克思列宁之上。何以他的理论的伟大崇高在马克思列宁之上呢？这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的结晶。我确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一定成为新世界精神的物质的建设之指导原则，世界一切革命的国民，在他们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悲惨之后，一定会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促进人类进化、社会进化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只有能够说明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造成人类真正文化的基础。中国人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世界一切人类，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得平和，是可以垂诸数千年而不变的。这是一句精确的话，可以说明先生的主义的伟大。

中山先生的主义最崇高的一点，是在他说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人失自信力即死，失却道德的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这是成己成人的要义。社会是人类的集合体，各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则各人失却自信力，而社会的意力，也就不能巩固，国家和世界的幸福，都无从产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有固道德的教义。口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实际所行的，却是俄国前几十年以唾弃一切为宗旨的虚无主义，和世界大都会中的游荡空气所产生的享乐主义，一切只有性的放纵，对于男女关系是如此，于是对于一切事物，无往而不如此。这种行为，本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直是革命的发酵性所产生出的废物。如此的共产党，只有造乱，哪能建国？



性的放纵的结果，就是造杀机，造死因，绝没有生机生因可以造出的。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及一切的遗教，根本绝不是如此。即使世界的人类，今天不能觉悟，各国多数的民众，仍旧迷信马克思主义，便是将来得到马克思主义实行之后，也必然的一定会回到孙先生的教义上来。因为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信的基础，世界一定没有和平的一天。战国时代，大家都鄙弃孔子的教义，所得的就是几百年的战乱，要到得秦楚之交，人口几乎灭尽的时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义是平和和幸福的基础。

(中略)

我们学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学他的思想主义，要学他的行为，学他的存心，多一个人学他，就是中国多一点生机，多学得他到一点，就是多一点的生机。本来革命是一件困苦艰难的事业，中山先生说，不怕死就是真革命党，不怕死而肯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党。我们党中的同志，思想行为，都能确实相信中山先生，而能刻刻以死生去修得他保持他的能有几人，所以国民党从改组以后，自杀到如今。但是我们领袖同志当中，我们看蒋介石同志，他为了保持继续总理的事业，能够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能够有这两个特点，一个党是要历史继续的，有了历史的保障者之努力，今天在断续存亡的时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来，今后怎么办呢，就是全党的同志，大家要齐心一德地，一点不怀疑地，确信总理的遗教，拥护而且扶助着仅存的几个忠实的领袖，建设起纪纲来。由纪纲的确立，建设起纪律来，党才可以救，国才可以救。

我们从前对于总理随时所取的政策，时时反对，不能明了，到事后才渐渐地明白他的价值。张蒋等中央诸同志，在今天能够不被过去党内的决议，以及虚伪的民



众操纵者，所制造的环境迷惑颠倒，毅然决然的行动，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的力量，和中国民族历史的力量，所发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能力。这可以晓得是民生主义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会民众要求生存，在必要时候，便于发挥他的能力，我们不能不认识社会生存意力的伟大，和不断的为社会公众求生存的努力的伟大，不能认识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时时刻刻会被伪虚的社会意力锁住，莫有坚强的为社会公众求生存的努力，也时时会被空理论迷住的，由是我们的同志，是要确信真正党的指导者，是党的历史保障者，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保障者，中国国民前途无限的生机，都是在此。

国民党同志的毛病，是人人抱一种特殊的幻想，而怀疑他人，怀疑自己，时而自己被自己的智识经验迷住，时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时而被不真确地民众意思迷住，时而被组织和纪律的意思迷住，时而被朋友的感情迷住，时而被国家和民众的利害迷住，就会生出怀疑来，这种怀疑，只有确信总理之主义而决死，才可以胜得过他。然而这一个奉唯物教的共产党，他在党中来发挥一种特殊的理论，和人物分析，立出许多派别来，对工农就教他只争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对学生就使他只信马克思列宁而鄙言孙文，因为有了这一个痛肿在国民党内，年长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医也医不得的大毛病。现在已经割了，国民党呢，在此刻只有下一次决心，和总理在二次革命后，创立中华革命党一样，完全从新作起，方才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险，是怎样呢：

官僚军阀坐收渔人之利，而帝国主义者，乘势进攻，国民党外抗帝国主义，内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力尽势竭、日趋危险，而中国国内，重陷于辛亥年因武汉



南京之争而袁氏专政之现象，国际间引起第二巴尔干战争之乱局，且至发生全世界人人所日夕求避免之第二大战，上海变为君士但丁，而张作霖等于土帝，数十年中，中国全国无干净土而完全陷入黑暗时代。

要避免这一个大危机，只有全国一致地，在总理主义之下面，造成一个青年的国民党，照着总理的主义去干，干成功了中国今得天救，就是中途失败，而留着一个失败的历史，将来中国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业，是永远的生机，失败的教训，也是永远的生机。中国民族中有了一个孙中山先生，这就是中国民族得救的元素，只要全国的人，信仰孙先生的主义，信仰他是实行的起点，实行他就是成功的起点，决死就是解除怀疑的起点。我们认识蒋介石同志，这一次的护党救国，他是从许多怀疑当中，以决死去争出一条生路来，以决死去造出一个自信来的，过去两年间的忍耐和这一中的决心，是我们作人的模范，尤其是作党员的模范。

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但是受了二次代表大会的打击，而大多数的先辈同志主张，都是偏向一边，国际的压迫，又一天一天的强烈，便引出我自己的怀疑来，怀疑的结果，变成了极端的精神衰弱，这个结果，只是不能以死去争自信，现在国民党的自信回来了，我确信国民党当中，所有的派列，原因只在怀疑，怀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要点，是在不能够确信中山先生主义，在世界上是后来居上。更有一个问题，就是联俄的问题。俄国是欧战后一个新国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国主义的国家，立于反对的地位，而且他是对于中国，最先取消不平等条约，总理当时主张联俄，



就是为此。但是我们联俄的要义，是站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不是和共产党一样的见地，而且我们决不能作第三国际的附属品。

在过去两年当中，国民党对于联俄的问题，因为共产党的关系，变做实际和俄国莫有交涉，对有第三国际的关系，更是完全受共产党间接的支配，国民党是一点莫有提出过甚么要求和主张的。更有一层，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代表。我们过去两年当中，因为自己的地位，没有巩固，不曾提出这个问题来，现评我们应该很明白地了解，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

对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不只一国，德国也和俄国一样，是战后革命的新国而且他在中国一切的权利，都抛弃干净了的；最近墨西哥对于中国，也自动的废弃不平等条约。总理遗嘱上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应该要认清以平等待我的，不只俄国一国。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应该提携，不是真实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应该反对，这才是立国的道理，才是争自由平等的路径。

我们看看，世界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晓得东方已经回复到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机，同时世界也现出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战争的必然性，虽然不能绝对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对的避免。欧洲战争后的结果如何呢？罗马诺夫亡，该萨亡，约瑟夫亡，一切战胜战败的国家，没有一国，不是受



绝大的打击。可知战争是绝对的罪恶，以战争求国际的胜利，和对殖民地的压迫成功，这是一种妄想。英国现在所取的对华政策，是造成世界第二大战的恶因，和开英帝国倒溃的路，此外一无所有。其他的国家，如果和英国一样，也是自己造灭亡的路，无可疑的。我们中国为民族的利益计，现在的时期中，应该要努力唤起世界民众的注意，一致反对英，日等国制造世界战争的政策，保持世界民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中国民众此时，要觉悟到我们一致团结在青天白日旗下，预备不可避免的决死时代，时时存决死的心，努力作求生的事，中国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后世界如果和平破裂的时候，中国人决不能像日俄战争和欧战时可以旁观的。

列宁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与 战术

胡汉民

我们的努力，要努力于革命，不能努力于捣乱。共产党的努力，实在不是革命，不但我们以为如此，就连共产党自己也很明白是如此的。我到俄国去，会见他们政府中的领袖，他们都这样对我说，“你们的革命总不要再蹈我们俄国错误的覆辙。”这是许多人所共知共闻，不是我一个人造出来的。他们既自以为是“覆辙”，又明白劝我们不必去“蹈”，我们如果偏偏要去蹈一蹈，到底算得一回甚么事呢。一方面在中国的许多共产党，对人讲起来口口声声都总中国不能行共产，又说是加入国民党，去实行国民革命，轻易不把他们自己的主张明白给人知道，好像实在拿不出来似的。至于他们的行径，却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那里捣乱，



并非革命。你想，在中国的共产党始终不公开他们的主张，在俄国的共产党，又明白教人不要去上当，这不是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的主义实在不能实行，他们的努力实在是捣乱，不是革命吗。

照共产党的种种政策看来，列宁主义实在不成其为主义，犹如梁山泊上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一样。不知道他们究竟所替何天，所行何道。史丹林曾说过，“列宁主义乃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术”，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俄国的劳农专政，并不是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共产党在那里专政罢了。他们嘴里虽说现在一定要让共产党专起政来，将来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但是这句话谁敢保证呢。自从共产党专政以来，俄国遭了莫大的杀戮，闹了莫大的饥荒，也不是死亡了多少万人，这就是他们要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试问无产阶级本身得着的好处，究竟在哪里。结果不过是被人利用罢了。

所以我敢把史丹林对于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改一改，“列宁主义乃利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术”。这样一看，列宁主义还成个甚么主义呢。列宁先生的蒲列罕诺夫曾指斥过民意党说，他们只知道利用工人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机到了，不知道为工人去革命，诚然应该，若为了革命，才找出工人来，便大错了。犹如礼拜日是工人要休息而定的，至于工人绝不是为礼拜日应休息才有的。为革命才找出工人来，这种革命，明明白白是利用工人，而别有所为，并非真为工人的利益的，这还成个甚么革命，成个甚么主义呢？

在这里我可以附带报告一事。



当我到俄国去，见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夫时，以为第三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机关，不是苏俄包办，不是一二人所操纵利用的，对于一切弱小民族一定是大公无私推诚容纳的。我就要求以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要求他将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计划告诉我，我也将我们革命的计划报告给第三国际，彼此合作。齐诺维夫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敕德金（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之一）很以为然，其他英法共产党领袖都不反对，不料苏俄共产党的主席史丹林和布哈林却从中多方的阻挠，后来连齐诺维夫也给他们打倒了。

接着我会见日本的共产党领袖片山潜，他问我：“你们中国国民党为甚么要分出左右派来，互相攻击呢”。我实在觉得没有话对答他。因为左右派的花样，明明是俄国共产党造出来，离间我们国民党的政策，连片山潜虽也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都蒙在鼓里，不曾知道，岂不可叹。由此证明第三国际还是在俄国共产党操纵之下，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也都在俄国共产党少数人蒙蔽之中。俄国共产党究竟怎样一个宰割世界，只有他们自己几个人知道，其余的人都被瞒过了，这是一种甚么革命手段，是一种甚么主义，实在莫名其妙了。像我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是天下为公的，一切明白宣布出来，给全世界人认识研究采用，才称得起是一种伟大的主义和革命。至于鬼鬼祟祟，不肯告人，阴贼阴狠，专门捣乱破坏的，算得甚么呢？向这样目标去努力的又算得是甚么努力呢。

总之，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实在是反革命。我们简单点从两点看去，便可以知道了。第一，凡是革命都应该牺牲自己，去为他人的，他们的举动，却都是牺牲他



人，来为自己，这不是反革命是甚么。第二，凡是革命，都是推进世界向前的，没有个开倒车的革命，他们的行为，却明明白白是将世界向后拉，回复到野蛮混乱的时代去，不是反革命是甚么。他们的努力，是向着他们的目的做去的，他们的目的既如此，他们越努力，世界越不了，这种努力，根本就该禁绝，还有甚么足以夸张的呢。

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之社会革命之比较

萨孟武

中山先生提倡国民革命，马克思提倡社会革命；国民革命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此盖中山先生生于中国，马克思生于泰西，二者所处之环境不同，故其革命目的，亦复有异也。详言之，当马克思之时，罗马帝国已归崩坏，民族国家早已成立，且自法国革命以来，民权思想澎湃全欧：各国无不发布民权主义之宪法，当时人民所感之苦痛，惟有资本主义之压迫，故马克思乃提唱社会革命，而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也。反之，中国则自满清末季以来，外有帝国主义之侵略，内有官僚军阀之压迫兼以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故中山先生提倡国民革命，而以三民主义为目的也。中山先生曰：“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即此之谓也。



革命目的既由社会环境而有差别，则实行革命之手段，亦当视社会环境如何而定者，更不待论而知矣。马克思曰：“共产党以隐秘其见解及企图为卑劣，彼辈敢对众宣言，惟利用暴力，颠覆一切从来社会秩序，始能达成目的。”恩格尔亦曰：“暴力在历史上，有一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是也。暴力，用马克思之言表之，实旧社会产生新社会之产婆；实贯彻社会运动，而打破硬化与枯死之政治形态之器具。”是马克思、恩格尔固曾鼓吹暴力之革命也：但马克思又有言曰：“劳动阶级欲建设劳动之新组织者，必须夺取政权。……然夺取政权之法，各国不能相同，当顾虑其地之制度习惯。余意在英美二国（荷兰大约亦然），劳动阶级可用平和之法，达此目的。但一切国家则非皆然。”

是则马克思除暴力之外，又主张劳动阶级可用平和手段，实行革命也。然何种国家当用暴力手段，何种国家当用平和手段乎？恩格尔曰：“在议会握有全权，由人民之去就，而定议会立法方针之国家，旧社会可于平和之中推移为新社会，如民主的共和国之法美及王室无力干涉民意之英国是也。”盖在民主政治之国，劳动阶级有言论结社之自由，又有选举之权利，故可利用宣传组织以及普通选举，占势力于议会，由此而夺取政权也。反之，在专制政治之国，则人民只受压迫，毫无自由，绝对不能用平和手段，达此目的。故恩格尔又曰：“德国不许公表共和主义之政纲。此实可证明：德国不能用平和手段，建设共和制度，更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也。”

余意革命手段原不限于暴力，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奥大利之革命，只由议会宣布共和，未曾丧折一矢，即其明征。然此当有二种要件而后可：第一，中央政府可以



驾御各地，故中央发难之际，各地亦闻风而倒；第二，立法议会当有最高权力，故能制胜于议会，即可推倒政府。此二种要件，在今日中国，皆不之有。故中国革命非用暴力不可。中山先生虽未曾明言暴力之革命，但若综合其各种言行而观之，则知吾言之非伪。中山先生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而在军政时期之内，则主张“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故由此点观之，实无异欲用暴力，实行革命也。故乙未革命于广州，庚子举事于惠州，丙午举事于萍乡醴陵，此后革命军起义，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中山先生之命令以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魂者，则有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徐锡麟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才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之击凤山。由此观之，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实完全运用暴力以实行之也。

革命之目的与革命之手段，固当视社会环境如何而定。而于革命之步骤，则无论在何社会，大体无不相同。盖革命之直接动机，在于夺取政权，而后再用政权之力，改造国政，然此须有一定步骤而后可。即最初当准备如何夺取政权，其次当实行如何夺取政权，最后当运用政权，而谋如何改造国政。故革命之步骤可分三期：第一为准备期，第二为破坏期，第三为建设期，此实任何革命，无不相同者也。



关于此点，最能表示马克思之思想者，莫如列宁。列宁在其所著 *The Soviets at Work* 中有言曰：“第一问题，在使多数国民深信其纲领与政策之正当。……吾党第二问题，为政权之获得及反革命之镇压……第三问题最为紧要，而为现在时期之特征，此即俄国之产业的组织也。”由此一文观之，可知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准备、破坏与建设三大时期焉。但此区别不过其大纲而已，若就其细目而言之，则在准备时代，尚可分为宣传与组织。盖此时国家权力，尚在有产阶级之手，故劳动阶级惟有利用言论之自由，宣传主义，利用结社之自由，组织团体，以备将来夺取政权也。在破坏时期，则一面当颠覆有产阶级之支配，而夺取其政权，他面当镇压反革命，而扫荡其势力。

至于建设期则更可细别为过渡期，半成期，与完成期三种。马克思曰：“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之间，有一革命的变革期，以乘其缺。因此又有一政治的过渡期与其相应。此时之国家，不外乎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又曰：“无产阶级利用其政治的权力，渐次没收一切资本于有产者，而集中一切生产机关于国家，即集中于支配阶级之无产者之手，尽力谋生产之迅速增加。”即主张无产阶级在过渡期之内，对于政治，当行一种革命的独裁，对于经济当没收一切资本，归于国有也。一切资本既归国有，则在经济上已无阶级之别，故无产阶级之独裁，一至此时期，亦失去意义。不过人民数千年来，在经济生活，悉受个人主义之支配，今一旦欲脱离个人主义而跃为共产主义者，事所难行，故又有半成期之办法。

马克思曰：“吾人兹所讨论之问题，非真正之共产主义的社会，乃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产生而来之共产主义的社会。即在一切经济的道德的精神的关系之上，尚不



脱其母体之旧社会之遗风也。在此社会之内，一切生产者——除去社会所必要之费用之外，——可取还其人对于社会所给予者。其给与于社会者，为其人之劳动量。”即马克思主张此时经济组织当从各人劳动之分量，而定分配之标准。夫各人既应其劳动分量，而有一定权利，则为保护权利之故，常有一种之组织的社会力量，故此时在政治上国家尚有存在之必要。半成期经过之后，始入于共产主义之完成期。

马克思曰：“在共产主义之更高阶梯之中，个人由分业而生之奴隶的从属，已归消灭，从而精神的劳动与肉体的劳动，亦无区别。劳动非为生活之手段，乃为其自己之第一生活要求，且个人之全面的发展与生产力同时增加，即公共富源，亦极丰富。——此时社会始得跃出有产阶级之法律的地平线之外。而以“各尽所能，各取所欲”为其标语”。即马克思以为：此时经济组织与此前迥然不同，各人可应其能力而劳动，各人又得从其欲望而消费。然各人既得应其能力而劳动，又得从其欲望而消费，则社会上已无强制之事，从而组织的权力，亦无必要；故此时国家，归于“死亡”，而变为“各人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之团体”。今再将马克思之社会革命之进行步骤列表如次：

社会革命	}	准备	{	宣传
				组织
				夺权
		破坏	{	镇反
				过渡
		建设	{	半成
				完成



中山先生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军政时期，乃从事于破坏。训政时期，乃从事于过渡之建设。宪政时期，则从事于完成之建设。故由此点观之，甚似中山先生之革命步骤，惟分破坏与建设二期也。但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革命中，曾讨论革命之运动曰：“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是则中山先生除破坏期与建设期之外，亦曾辟一准备期，以谋宣传与组织之工作也。

至于破坏期（军政）与建设期（训政及宪政），则中山先生曾著建国大纲一书，规定其进行之步骤。又于中国之革命中说明之曰：“此乃荡涤旧污，促其新治，所必要之历程，不容一缺者也”。故吾人欲知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对此不能不有详细之说明。

军政时期除破坏之外，更当从事于宣传，故“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换言之，即一面当颠覆旧政府之支配，而夺取其政权，镇压反对党而肃清其余孽，他面又当宣传主义，使全国民心，尽归于己也。如斯进行，达至“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此时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中山先生极注重训政，其言曰：“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由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又曰：“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借，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势显然。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缺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此时各省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平定之后，而各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各县“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



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及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失职，则国民大会。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为五权宪法。”至于一县之自治团体，则“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负托于国家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故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之进行步骤，可列表如次。

国民革命	}	准备	}	立党
				宣传
		破坏	}	举义
				军政
		建设	}	训政
				宪政

由此观之，中山先生与马克思关于革命之进行步骤大体相同。其不同者，不过马克思分建设期为过渡期，半成期，与完成期三种；中山先生则分训政（过渡期）与宪政（完成期）二种而已也。

综上所述，即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之社会革命，除宣传之主义有所不同之外，其他主张大体相似，故吾人最后对于主义不能不再有一言。夫革命之目的，在于破坏旧政治，而建设新政治，故宣传之际，当兼破坏与建设而言，一面使人



民要求旧政治之消灭，他面使人民希望新政治之出现，旧者消灭，新者出现，而后革命目的，始能达成。吕邦（Lebon）曰：“从来革命，未有不以军队为后援，然军队之运动，虽可颠覆政府，但革命之有极大效果者，必须一般国民，有不平，又有希望。”盖有不平，故欲颠覆旧政治；有希望，故欲建设新政治也。但无论何种民族，皆有一定心理，一定惯习，一定能力，政治设施即应此心理，合此惯习，并照人民能力而建设者也。故宣传之主义，不宜贪高务远，一面当可救济旧政治之缺陷，他面当可指示新政治之方针，而后始能合于社会要求，为社会之药石，非可冒昧滥作，亦非可传播外国思想而雷同之也。

今日中国人民最感之苦痛为帝国主义之侵略、为军阀官僚之压迫、为民生之困苦，于当用三民主义以救其病，至于共产主义，虽如中山先生所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然只能救济民生之穷苦。故中国共产党欲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者，实无异欲用“单方”以医疗百病之身也。况中国共产党，欲用赤色帝国主义之侵略，以代白色帝国主义之侵略，欲用共产党之专制，以代军阀之专制乎！

更进一步观之，民生主义虽云“就是共产主义”，然其达成之手段，亦复有殊。盖共产主义乃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而民生主义则用平和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今即假定革命手段，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然据马克思所言：则须以资本之集合与集中为前提，盖社会上之资本，尽集合于大规模之产业，尽集中于少数人之富豪，即将此资本移归社会公有者，事之至易，且资本之集合与集中，由他而言之，即为工厂之发达，因工厂之发达，由是多数劳动者，前之散在各地者，



今则尽吸收于同一工厂之中，从而彼此之间，遂有共通感情及共通思想，而有团结之机会也。

今中国之资本果已集合与集中乎？吾人若观各地情形，则诚如中山先生所言：“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且中国小贫之家，多系奸官恶吏土豪地霸；吾人对其财产，尽可根据法律，以没收之，何必假手于共产主义，更何必因没收奸官恶吏土豪地霸之财产，而祸及一切平民乎？国内财产分散于一般人民，吾人何能一一没收之？若欲于没收之后，再仿学苏俄而行新经济政策，是无异先破牢而后补牢也。

要之，今日中国人民，因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之骚扰，无论农工商学皆奄奄一息、不可终日，故今日中国所要求者，为产业之发达与面包之加多，而眼前欲求产业之发达与面包之加多者，不能不承认资本制度之存在。中山先生曰：“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马上推翻。”故今日中国之经济政策，从企业之方面言，除“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海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对内政纲十五）之外，其余产业，皆不宜妄加干涉，应听其各自努力，发达向上。

且对此等新兴产业，不但当消极的放任，又当积极的保护。中山先生曰：“我们要发达中国的工业，便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



部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须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即此之谓也。

从劳动方面言，则宜“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对内政纲十一）详言之，对于农民，则凡“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对于工人，则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但如斯政策，虽可振兴产业，优待劳工，尚不能防止资本主义之跋扈，故中山先生又提倡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使私有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并可由此而渐次改造社会之经济，达于大同主义。中山先生曰：“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吾人对此数言，当三致意焉。



布尔札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萨孟武

布尔札维克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之一派，而其首领列宁，又自命为马克思信徒，故布尔札维克主义之理论，大体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其不同者不过战术而已。简单言之，即社会革命之条件，获得政权之方法与行使政权之形式，颇与马克思之见解不同，故乃别成一派，而有其特殊地位也。

先就社会革命之条件言之，马克思曰：“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梯，遂与其从来所借以活动之现存生产关系，或仅表现于法律上之所有关系，互相冲突，由是此种关系，遂由生产力之发展形式，一变而反为其桎梏，而社会革命之时代，因焉以生，巨大之上层建筑全部，随伴经济的基础之变更，或疾或徐，终归变革。”是则马克思乃主张社会革命，惟于社会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之桎梏时，始能发生也。故马克思又曰：“一种社会组织，若其一切生产力，在旧社会中，尚有余地，许其发展者，非完全发展之后，决不颠覆。而更新更高之生产关系，非其物质的存在条件，已酝酿于旧社会中者，决不出现。”换言之，即惟旧社会之组织，可束缚生产力之发展时，旧社会始能颠覆；又惟新社会之物质的条件，已存任于旧社会之中时，新社会始能出现也。今俄国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发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未为生产力发展之桎梏，而乃举行社会革命，此由马克思主义观之，果能成功者乎？



一九一九（注：疑一九一七之误）年四月八日，列宁由瑞士遁回俄国，曾寄书于瑞士劳动者，与其诀别曰：“资本主义的战争，必能引诱各国之革命。然此使命，则在于俄国无产阶级之肩上。……俄国无产阶级之组织，固不及他国劳动阶级之巩固，而其精神，亦不及他国劳动阶级之发达。……但由特别历史关系，俄国无产阶级在最短时间之内，实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前锋。俄国为农业国家，共产党之发展，乃在欧洲各国之后，故社会主义必不能得胜利于俄国。不过俄国农民，因有封建的土地所有权之存在（据一九〇五年之经验所示），故对于俄国之资本家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必能与以极大之冲突，使其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序幕，及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之发端。”由此观之，列宁此时固因俄国产业尚未发达，无产阶级尚未成熟，而谓革命必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惟能刺戟国际的劳动运动也。

然列宁一归俄国，因政治革命，已得胜利，遂忘及俄国产业尚未发达，无产阶级尚未成熟，而欲于一举之下，实行社会革命。其党员拉得克（Radek）曰：“社会革命，非发端于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国家，乃发生于劳动者最受资本主义蛊毒之国。”布哈林（Bucharin）亦曰：“俄国之资本主义，已较一切外国资本主义，早归崩坏。此盖世界战争所生之损失归于俄国负担者最大也。俄国有产阶级，不及英德美等国之强大，故不能处分战争所赋课之要求，亦不能一扫工人与农民之反抗，反之，俄国之工人与农民，则能推倒有产阶级，而夺取一切政权，归于布尔札维克之手中。”是则布尔札维克固明白主张：俄国资本主义虽未发达，然同时有产阶级亦无权力，故劳动阶级推倒资本阶级，乃较其他各国为易。换言之，社



会革命不仅能发生于产业未发达之国家，且产业未发达之国家，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也。此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如何背反，吾人可一望而知之也。

次就获得政权方法言之，共产党宣言曰：“在现今社会之内，经过多少内乱，而爆发为公然之革命。由是无产阶级遂利用暴力，颠覆有产阶级，而树立其支配。”又曰：“共产党以隐秘其见解及企谋为卑陋。彼辈敢对众宣言，惟利用暴力，颠覆一切从来社会秩序，始能达成目的。”是马克思固曾主张使用暴力，获得政权也。但马克思又有言：“劳动阶级欲建设劳动之新组织者，必须夺取政权（然夺取政权之法，各国不能相同，当顾虑其地之制度习惯。吾意在英美二国，荷兰大约亦然），劳动阶级可用平和之法，达此目的，但一切国家，则非皆然。”是则马克思除暴力之外，又主张劳动阶级可用平和手段获得政权也。

然夺取政权之法，何故除暴力之外，又可用平和手段乎？恩格尔曰：“在议会握有全权，由人民之去就，而定立法方针之国家，旧社会可于平和之中，推移为新社会。”盖在民主政治之国，劳动阶级有言论结社之自由，又有选举之权利，故劳动阶级可利用宣传组织以及普通选举，占势力于议会，由此而夺取政权也。

反之，列宁则崇拜暴力主义。以暴力之革命为真正之革命，故其推论之结果，不能不承认内乱。列宁曰：“承认阶级斗争者，亦当承认内乱。内乱在一定状态之下，可使阶级斗争，愈能继续，愈能发展，愈能激烈，而现出大革命之事实。凡否认内乱，或忘却内乱者，必陷于极端之妥协主义，而放弃社会主义的革命。”又曰：“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若无对外战争，而又无国内战争——



内乱者，必不发生。”即主张无产阶级当用内乱，获得政权，不能用平和手段以获得之也。

列宁既已主张内乱，故其结果，又复主张恐怖。列宁曰：“有产阶级之辩护士，每反对吾人利用恐怖。……然英国之有产阶级，实忘一六四九年之事，法国之有产阶级，实忘一七九三年之事也。有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之故对于封建支配，而使用恐怖之时，则为正当，则为当然。反之工人与农民，对于有产阶级，而使用恐怖之时，乃视为惨酷，视为犯罪。绞取的少数人，欲夺取他绞取的多数人之地位，而使用恐怖，则为正当，则为当然。反之，为多数被绞取阶级之利益，欲排除一初绞取的少数人，而使用恐怖，乃视为残酷视为犯罪。”

此言与恩格尔所谓：“无产阶级，愈能采纳社会主义的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则革命必应此程度，而减少流血复仇及愤怒之念。……共产主义可压倒无产阶级之愤怒，盖共产主义为人类共同之事，非劳动阶级一己之事也。故英国之劳动阶级，若能采纳社会主义的思想，则其愤怒已无必要，而对于有产阶级之态度，亦必失去凶暴性质。余深信：在斗争勃发之前，劳动阶级全部，若能变为共产主义的，则斗争必能行于极平和之中。”如何背反，实可一望而知之也，夫劳动阶级在社会上既占绝对多数，而又用合法手段（普通选举）获得政权，则其势力甚固，何虑有产阶级之反抗；而有产阶级反抗之时，又可用多数决之力，加以镇压，何必利用暴力手段以恐吓之耶。



三就行使政权之形式言之，马克思曰：“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之间，有一革命的变革期，以乘其缺，因之，又有一政治的过渡期，与之相应。此时之国家，不外乎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然所谓无产阶级之独裁，果即主张无产阶级在过渡期之内，当禁止有产阶级之言论自由，并剥夺有产阶级之选举权利，而行一种之独裁政治乎？恩格尔曰：“近来德国俗人，一闻无产阶级之独裁，无不恐怖，然诸君欲知独裁之真意者，可观巴黎公社，此即无产阶级之独裁也。”故吾人欲知无产阶级独裁之状况者，不可不知巴黎公社之组织。今据马克思所言：“公社乃用普通选举，由巴黎各区所选出之市会议员而组织之。……其中多数为劳动者或劳动阶级公认之代表。”是则无产阶级之独裁，乃根据民主主义、由自然之成行，而现出独裁之结果。换言之。独裁之意，虽解作独揽政权，但独揽政权之法，非用暴力，乃因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既占绝对多数，故一旦实行普通选举，必在议会之内，获得最大势力，而独揽政权也。

列宁既自命为马克思主义之信徒，故亦主张无产阶级之独裁。其言曰：“伟哉独裁之言也！然此伟大之言，不可托于空言。独裁状如铁椎，可以迅速之间，打倒绞取阶级与投机分子。”但列宁所主张无产阶级之独裁，其形式又与马克思不同。最初则反对普通选举，而要求无产阶级之专制，故于宪法之上，排斥资本家，地主，教师以及帝政时代之官吏之选举权。（俄国宪法第六十五条）其次又要求共产主义者之无产阶级之独裁，谓其“当掌握政权，引导全国民众，进入于社会主义的秩序之中，且当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从事斗争，而改造社会生活之际，此辈又为一切被绞取阶级之指导者。”即列宁非用多数人之独裁，以代少数人之独裁，



则此独裁，除少数人之外，无论农夫，无论工人，无论贫农，皆当屈伏于其下，故此时已非“无产阶级之独裁”，乃为“对于无产阶级之独裁”也。

布尔札维克王义既主张使用暴力实行独裁政治，故不能不夺反对党之武器。反对党之武器，除选举权之外，尚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布哈林曰：“共产党对于有产阶级，必不能与以一切自由：……故出版若有问题，吾人当先问其为何种之出版，为有产阶级之出版乎，抑为无产阶级之出版乎？集会若成为问题，吾人当先问其为何种之集会，为有产阶级之集会乎，抑为无产阶级之集会乎？同盟罢工若成为问题，吾人尤当先问其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之同盟罢工乎，抑为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之同盟罢工乎？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乃为阶级斗争之器具，而在革命时代，则与火药，炸弹，机关枪，同为内乱之器具。但问题所在，则为何阶级对于何阶级而使用之耳。”实则布尔札维克固已严守此种主张，且用宪法以保障之矣。

(下略)



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

潘公展

一、导言——读中国共产党最近决议案的感想

中国共产党，直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指挥，间接受苏俄共产党的指挥，在中国国民党厉行清党以后，知道这种寄生附魂的方法已经失败，要想在中国标榜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幌子，来煽动一般无智识的农工，做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能不另起炉灶，率性抛开了国民党，自己挂起“布尔札维克”的招牌来，大吹大擂一下。

他们最近开了一个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议决了今后共产党的任务，也就是他们现时的总策略。我在朋友处看见一本第六期的布尔札维克，中间所记着的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运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运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他们又说：“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种策略，可以说是“制造暴动”的策略，也就是牺牲农工，为狗群众的策略，张溥泉先生称为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吴稚晖先生称为“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实在不是冤枉他们。



单看上面所说中国共产党目前努力的三点，似乎还不能尽量发现他们所采方法的狠毒性，我且再一述他们今后的口号和政纲，他们现在既然不为国民党所容，他就不再托庇于“国民革命”四字之下，完全显出“阶级革命”的色彩；所以，他们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要用暴动的手段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换言之，“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乃是他们鼓动武装暴动的总口号。至于政纲呢，他们对于乡村农民方面，所用为诱惑的香饵的有下列数条：（1）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2）完全取消租田制度；（3）同盟抗租抗税；（4）取消一切苛约和重利债务；（5）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6）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

对于城市的工人和贫民，他们高呼着：（1）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2）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3）工厂归工人管；（4）厉行劳动法；（5）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6）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从这种口号和政纲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今后所走的途径，完全是想亦步亦趋的学那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共产党，他们迷信了列宁的理论，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要在生产落后的地万，才得成功。因此渴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落后的国家里，生吞活剥地干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来；他们上面所用的口号和政纲，原不过用来欺骗一般无智识的工农群众，跟着他们造成“红色恐怖”以便夺取政权，而其结果之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又何尝值得他们作一度的思索呢？



中国共产党用甜言蜜语来欺骗群众，下狠心辣手来牺牲群众，原不是目前的新发明，也不过因袭他们祖传的家法。中国共产党的祖师，当然是苏俄共产党的领袖列宁了，所以他们所干的勾当，不过是窃取列宁的唾余，中国共产党所标榜的“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率直言之，就是标榜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已。

列宁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以为乃是无产者握有压迫资产者的统治权，不受法律的制限，完全以暴力为根基。布哈林在共产党的计划中尤其阐发得明白，他说：“专政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强的权，决不宽恕仇敌的权；劳动阶级专政的意思，就是劳动阶级管理国事的权，压制有产阶级和地主的权。”他又说：“……暴力是为革命和建设共产制度所必要的，是劳动者专政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劳工手里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一柄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资本家。”而还有最老实爽利的一句话：“他们（共产党）的标语是用劳动者暴力政治，用无产阶级专政做到共产主义。”我们从列宁和布哈林两个人的说话里，可以知道共产党所标榜的政治，完全是“暴力政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鼓动无产者实行屠杀的残酷把戏而已，较之古代的专制帝王，现在的凶恶军阀，有过之无不及。

中国共产党党员秉承了列宁这种残忍的遗教，所以湘鄂赣粤一年以来受他们的荼毒，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还说南昌暴动的失败和叶贺潮汕的失败，其原因由于前敌指挥者不实行革命的政策，而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充其意之所至，必使中国没有一个乡村不发现农民暴动，没有一个城市不发生工人暴动，没有一处不杀人盈野流血成渠，而后大快于心！



其尤不可恕的一点，共产党主宰苏俄的经验，自己早已觉得共产主义之扞格难行，改变方针，采用了资本主义变相的新经济政策，已逾六年，却偏偏要挂羊头卖狗肉，硬把共产主义向中国宣传。明知中国生产落后，贫富阶级不甚悬殊，却偏偏要用种种方法，造成工农失业的环境，逼迫工厂非跟他们暴动不可。不过他们所借以号召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后无产者所得的利益如何如何，以致一般浅见的或甚而至于盲目的工农群众，被他们诱惑得不亦乐乎。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苏俄的景象，就可使工农群众顿然醒悟过来了。苏俄革命，今年已届十周，贫民游丐，何尝减少？国家富力，损失几何？所谓专政者何尝是普遍的无产阶级，不过是共产党专政罢了；更何尝是共产党——马克斯的忠实信徒，左右不过是几个变相的贵族甚而至于一个独夫在那里专政罢了。我想，要希望我们一般民众不上他们法宝的圈套，对于十年以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实有一度介绍之必要；因此，勉强参考了几种书籍论文，写这一篇，这是我作此文的动机。

二、自苏俄十年来历史的回顾

我在追述十年来苏俄历史之初，先要声明：我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好歹暂且不管，而对于共产党的行为，却不妨凭了他们所标榜的主义，加以批评，对于共产党治下的苏俄，更其愿意根据事实去下一种不偏不倚的判断，绝无特别好恶爱憎于其间。



自一九一七年俄国专制的皇朝推翻，共产党获得政权，到今年十一月，恰是十周年纪念。我们在目前能依据了事实，讨论苏俄政治的结果和趋势，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大幸，曾有一个时期，苏俄完全其他各国隔绝，真相不明，我们要观察也无从观察，要判断也无从判断，现在却不然，各国和苏俄外交上，商务上的往还，逐渐密切，游历考察的人，也前后踵接，著作风行。虽则苏俄政府绝对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但就他们党内的纠纷和报章杂志所透露的消息而观，已可见其真相之一鳞一爪，我们凭了这些事实，把苏俄共产党的政治作一个综合的观察，当然不是完全不可靠的了。

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换言之，为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起见，尽可把一切事物来做工具。惟其如此，十年中间苏俄的历史，在在可以发见共产党的专政者带有两种面具：一副是朋友，一副是仇敌；一副是未达目的以前的善士，一副是已握权力以后的凶神。当共产党没有执政以前，列宁是全俄主张民主主义的最有力者，他要使全民武装去争政权，主张立刻召集“制宪会议”，但是等到群众附和了他，他就因为“制宪会议”不能赞同他的政策，在二十四小时内用兵力去解散了。“制宪会议”解散以后，共产党政府依然自称为民众政府、“劳农政府”，正如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一样，那时候的“民众”、“劳农”不过被列宁看作用过的具而已。并且，他们既然自称劳农政府，而同时又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俄国的劳工和农人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而无产阶级不过约占百分之四，苟其真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能称为劳农政府了。



更进一层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又并非指全体的无产阶级，只有几个共产党党员在那里执政。那些不信仰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无产者，纵然是深信社会主义，其不见容于苏俄，正和其他“反革命”者异罪同科，即此可见十年来的苏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共产党专政。而共产党党员不到一百万人，只不过约占全俄人口百分之一的半数，那么，无产阶级实已做了共产党的工具。不仅如此，实际上目前苏俄的统治者，还不是共产党的全体，不过一个七人组织的“政治局”在那里发号施令，而即此“政治局”骨子里实在不过受斯达林一个人的主宰罢了。那么，连一百不到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也无异做了列宁、斯达林等的工具。工具主义发挥到这步田地，真是无以复加。

打开天窗说亮话，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谓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谓苏维埃，所谓选举，所谓民主，都不过掩耳盗铃之谈，我们看到列宁逝世以后，连立有大功的特罗茨基、徐诺维夫、卡米诺夫，都已先后遭受摈斥驱逐的待遇，就可以想见“民主集权”的真意实在和“独夫专制”丝毫不异。奈何还有昏聩之徒，醉心于“民主集权”的谬说，讽歌赞叹，以为世界，得未曾有，允宜学步邯郸？奈何还有无数愚昧的农工，受他们的催眠，甘于再做徒徒牺牲的工具而不悟？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且把苏俄十年来的历史分三个时期来略叙一番罢：（一）赤白斗争时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三）共产党分裂时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



（一）赤白斗争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宁与其党徒掌握政权之前，他们早有两次未成熟的革命的经验：第一次，当一九〇五年俄国在满洲失败之后，共产党乘机鼓动革命，可是他们缺少训练不能团结，而对于所恃为革命主力的工人，更其一些没有下过预备功夫，连浅近的标语口号都不能了解，结果自然失败。第二次，一九一七年七月间的革命，共产党揭举“和平与土地”的标帜，似乎可以吸收全国的同情了，可是兵士抗不受命，农人纷夺土地，革命何尝能够成功。列宁有鉴于此，竭力把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军，才很轻易的推翻了克伦斯基的政府。因此，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一面与德国先行签定休战条约，一面希望各国继续战争，而惹起德奥与协约国内部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以为共产革命势必普及于全欧乃至于世界的。他们这种妄想，能不能如愿以偿，暂且不说；但看他们在苏俄国境以内，要实行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觉得扞格不通了。

共产党把从前贵族和资产阶级驱逐出境，瓜分他们的财产，数给贫民，以为就是实行了共产主义；如果真这样容易，那实在简单极了，殊不知在混乱的时期，贫民靠了富贵人家瓜分来的家具，甚而至于金玉珠宝，究竟不能作为衣食的，于是不得不强迫征发农民的粮食分配应用，而农民乃大觉醒。到了一九一八年夏间，各地反革命的运动迭起；以农民为主力的社会革命党，到处做反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受了共产“恐怖”主义的感化，除了派人到各乡村去宣传反对征发农产品外，也到处杀起共产党来。那年八月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波兰有狙击列宁之举，反共产党的运动到了最高潮；于是列宁的党徒施行报仇的政策，不过他们杀不着社会革命党，只好屠杀贵族，兵士，和有产阶级的人们来出气。



不过共产党尽管用恐怖的手段来报复，终究不能平复反对的潮流和获得农民的粮食，因为那时农民已经归附于反共产运动之下，以为这是他们的救星了。列宁对此，没有办法，只好于一九一八年夏秋之交，把西伯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和其他苏俄南部的大部地方让给白党人物统治。

却不料白党得了一些势，就引起各国的野心，以为乘此机会联合助白攻赤，必能把共产政府根本推倒，其实，这一着反足以延长共产党执政的运命。一则俄国人始终没有忘记拿破仑的故事，一旦外兵侵入，反使共产党可以用爱国的名义，团结人民一致御外。二则白党其时正获胜利，见了有外国赞助，更加有恃无恐，遂由傲慢而趋于报复，失了他们初时救民水火的本意。那些白党领袖，渐渐不着眼于解救农民，却专顾到恢复地盘，同时因为共产党领袖是几个犹太人，就对于手无寸铁的平常犹太人，大肆屠杀劫掠；因此，在城市中心，白色恐怖的滋味也就不亚于红色恐怖。人民觉得以暴易暴，牛羊何择，同情心当然逐渐减低而至于消失。所以双方相持到一九一九年的秋冬之交，白党的势力先后消灭，除了日本有一部分军队尚在远东，蓝格尔的军队尚在克利米亚以外，几乎俄罗斯完全染成红色了。红军领袖特罗茨基因势利导，就把他胜利的军队，由革命军的性质，一变而为劳工军，换言之，无异把应募征兵的工人，练成有力的军队，而共产政府的基础始形稳固。一九二〇年夏，波兰受了几个英国军事代表的怂恿，突然进兵乌克兰境内的开伏地方，大败红军，而苏俄政府就檄令全俄人民，不分赤白，合御外侮，共卫祖国，居然有大批从前俄皇时代的军官应命而赴前敌。结果，红军大败波兰军队，长驱而入华沙，共产党认为鼓动全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至，詎知被法将惠干统兵于三日内驱逐俄军出波兰境。于是双方解和，恢复未战以前的



原状，苏俄赤化全欧的企图固不得逞，而共产党在俄国的政权却因此而更趋稳定。等到同年秋冬，蓝格尔军队失败，共产党遂统一全俄。

我们从这一段历史看来，觉得共产党在苏俄起初实在有失败的理由，而所以竟告成功者，完全由于外力的干涉和白党的傲慢。因此，我们应该觉悟，要反对共产党专政的残暴行为，第一不要仰仗外力，反使他们有爱国的美名可以假借，第二从事反共产运动的领袖和军队自己不要腐化恶化，失了民心！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上面我已说过，在一九二〇年末，苏俄共产党对于外来的压迫，逐渐解除，可是内部依然不十分安定。一九二一年春，克朗斯太军队叛变；一两月后，泰卜伏省的农民，因怀恨于粮食的征发，也继起叛变，惨杀粮食征发员和共产党人，连派往的一师军队也变了，到三月末，据说有二万五千人至六万人公然反抗。这些情形，足以证明共产党征发粮食的强制手段和废除交易的共产政策，实在不为一般俄人所欢迎。

列宁那时是一个狄克推多，他明白了这个缘故，就立刻下令，准许在泰卜伏省和邻近各省恢复金钱买卖的贸易制度，并且设法把食盐石油等等必需的物品赶快运到需要甚殷的地方，供给人民使用。这样一来，各地反抗的风潮顿时平息下来，那就更可证明共产党的政策实在有变通之必要了。列宁与其党徒相争相持了许久，到了同年八月九日，那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正式公布；从此，俄罗斯名虽共产党专政，而实际上已无异恢复其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地位，这就是俗语所谓“说真方，卖假药。”



自从新经济政策宣布以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形，没有多大变更。无论他们称新经济政策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好，“社会共产主义”也好，或者为两三年前共产党大会里有人称他为“共产资本主义”也好，总之，苏俄依然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却已经是有了不可动摇的铁证了。

苏俄政府循了这个变相资本主义的政策前进，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之交，共产党的成绩大有可观。紊乱的币制整理好了，游离的份子结合起来了，工厂的制造和商品的贸易都恢复了，于是俄国重复与其余的世界往还，不再被人们看做疯人院了。凡此种种，苏俄所以收再造之功，完全是由于采用新经济政策的效力。

新经济政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币制的整理和各种银行制度的恢复。苏俄共产党的计划，原来是主张一切银行收归国有，并且只许组成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换言之，就是由劳农国家独揽全体银行事业，而同时希望货币的废除。可是实际上他们不能这么办，只好采用新经济政策，整理币制，并且容许各种银行的存在。苏俄起初因国家度支、入不敷出，每年滥发纸币，以致币价大跌。一九二〇年，国家预算不敷数由发行纸币补足者，占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二〇~二二年减至百分之七十四，二二~二三年减至百分之五十三；二三~二四年减至百分之二十九。国家的生产力，既因采用新经济政策而逐渐加增，政府也就同时整理币制，一九二二年末，国家银行发行一种新纸币，以现金为保证，到了一九二四年春，信用渐立，旧纸币绝迹于市场，新币制的基础遂形确定。因此。国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国家税收也逐渐加增。



讲到银行，则最上有国家银行，不但统一发行纸币权，并且把国家经济的重要业务监集中起来。此外，有工商银行，资助工业和国内贸易；有外国通商银行，资助国外贸易，有电业银行，资助电气事业；有合作银行，资助一切合作事业；有中央农业银行，把一万五千个乡村信用贷款机关集中起来，为资助农业的总枢。总之，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运用银行的制度，确立货币的信用，苏俄政府的财政，方有回复而入于佳境的转机；我们于此，不能不佩服列宁临机应变的手腕高明，更不能不觉悟共产主义的方法不但不适用于中国，就连俄国也不适用。

（三）共产党分裂时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苏俄自一九二四年初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党内部逐渐分裂，如果列宁至今尚在，或者不致如此。不过无论列宁存在与否，共产党一方面不愿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不能不迁就俄国人民的习惯和观念，终必至于因畸轻畸重而起争执。史丹林和特罗茨基辈的分裂，就是一个好例。特罗茨基被解除陆军大权以后，于本年（一九二七）九月间，向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说：“当苏维埃政治局受我指导的时期内，我们尽力恢复对外的关系。我已经拟定了具体政策的大纲，苏俄对英美德实业团给予让与后，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得巨款，向外国市场购买苏俄所不能自制的机器和器具。”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当局不懂外人的心理，正和俄皇时代相似。自称苏俄政府的一派人物，其腐化而缺乏主义，也和俄皇的爪牙一样。凡反对这一派意思的人，其命运的危险。正和反对俄皇的敕令一样。”特罗茨基说了这几句话，斯达林就把他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开除了。但他们尽管分裂，而苏俄之需要恢复国际关系，已于特罗茨基寥寥数语中揭布出来。



苏俄何以需要恢复国际关系呢？因为今日之苏俄，真可谓离世界而孤立，而同时不得不有求于世界的赞助。对英邦交的断绝，对法关系的恶化，以至最近对华宣传的失败，凡此种种，均足证明苏俄外交政策之濒于破产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苏俄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在乎因苏俄的革命而引起世界革命，讵知欧洲休战而后，事实的演变并不如此。如法德关系的改善，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英国新劳工法的宣布，诸如此类，世界革命在西欧的动机完全没有。苏俄不得志于西欧，遂标榜“扶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鼓动近东远东民族独立的风潮。但是结果，则东方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固然一时蓬蓬勃勃，大有成功之望，而对于共产党的指挥却一概不甘再受羁绊。可是因为东方民族运动勃兴之故，英国对俄的感情日恶，而终至于绝交，若法若德若意也都对英表示相当的同情。由此，可见苏俄的国际环境，到现在实已非常恶劣，无可讳言。

但是，另一方面，苏俄生产力虽逐渐恢复到战前状况，却仍需要大宗资本，发展实业。一九二六年末，苏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桂毕希夫曾说，“各种工业最困难之点，是缺乏运用的资本。”今年（一大二七）三月间的报告，他又说，“一九二六年以前历年工业的发展，都只利用从前余存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现在几乎用完了。”即此可知苏俄实在需要外资的源源输入，使他工业，农业，矿业，运输业一一有大量的发展，——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苏俄既然有如此的需要，则其不能不设法恢复他的国际关系，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可是斯达林见不及次，宜乎特罗茨基不胜其愤激了。

四、产业的崩坏与经济的回复



要明了十年来苏俄的经济状况，必先说到俄国帝政时代的农奴制度。原来俄国旧俗，农民往往为大地主的奴隶，不啻为土地的附属物，可以买卖成交如牲畜一般，直到一八六一年亚历山大二世才解放农奴。但其时农奴解放，而土地依然不能为一般农民所有，贫困无减于昔，农业也没有比中古时代显著的进步。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推翻了皇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共产党既以“和平与土地”号召革命而成功，当然要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本来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第一步就要计划生产和分配方法的如何改革，而土地收为国有和废除市场贸易制度，遂成为他们入手的方案。现在先把苏俄那时的共产制度约略说明其要点：

（1）农业方面 照苏俄宪法第三条的规定，一切土地都归公有，不须何等赔偿，公平分配于农人；凡森林，水利，地下富源，家畜，及农具模范农场等，统归公有。这件没收土地的事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实行；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公布法律，详定土地分配，使用，和处分的方法。

（2）工业方面 苏俄宪法第三条又规定，要把制造工场，矿山，铁道，和其他生产交通机关全为苏俄所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开始没收工业；一九一八年六月，规定工业国有办法，没收矿业，冶金，电气工业等等一般大工业，把他们的产业和资本都收归国有。又凡经营这等工业的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等，资本在二十万卢布以上者，也都没收其财产。



(3) 商业方面 苏俄政府绝不承认个人经营的商业和贸易的，由国家管理生产机关，经营生产事业，按国民劳动成绩，由国家直接分配，所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中间，不许有牟利的商人，就连农产物的买卖，也为国家独占。惟其如此，不必有货币，更不必有银行，因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间和一九一八年一月间，没收银行和银行的债权现金，同时又取消一切公债。

苏俄的共产党人，以为这几种政策实施以后，生产分配的大权都操之于国家，凡积累的资本均已化私为公，社会无复贫富阶级之悬殊，人民只须出其劳力，即可以免费得到衣食住行教育医药娱乐等之享用，社会主义的黄金世界，自然就在眼前。詎知他们试验的结果，不但黄金世界没有发见，反而大闹饥荒，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间，全国的产业，由凋敝而趋于崩坏，几至于不能自存。

农业方面，因为土地收归国有，农产物都被征发，农民自然不愿意尽力耕种去得多量的收获，即使偶有余剩的粮食，也必秘密储藏。而且土地从大地主手里移转到国家，仍与“耕者有其田”的希望不相符合，他们农民的没有土地，和往日丝毫无二，又不甘心去多种田地。因此田地荒芜，收获减少，粮食恐慌的大问题，自然应运而生。直到新经济政策颁行以后一二年，方才渐有转机。试观革命以后历年的耕地面积数，就可明了共产政策时代农业崩坏之程度如何可惊！

耕地面积表（见前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校教授 S.N.prokopovicz 所著苏俄经济的歧途）

年份	耕地面积 (百万俄亩)	百分率
----	----------------	-----



1913	87·1	100·0
1916	79·0	90·7
1917	79·4	91·3
1918		
1919	56·6	68·4
1920	63·0	72·3
1921	58·3	66·9
1922	49·3	59·6

依据上列的数字，可以证明在共产主义的政策实施期内，农业逐渐衰败。到了一九二二年，耕地面积较一九一七年减少百分之三四·六，较战前减少百分之四三·四之多，其农产物的锐减也就不言而喻了。

工业方面，因为一切大工业都归国有，工人握权，工厂管理不得其法，专家退避，原料缺乏，机械损坏，工人工作能力退化，运输工具缺少，以致工厂大部分陷于停顿，几乎不能生产，就使少数能勉强生产的，数量也当然大减。观左表，可知工业上所受共产制度的损失比农业还要重大！

大工业工人生产能力表（同前表）

年份	工人数 (千)	百分率	生产额 (百万卢布) 以 1913 年物价	百分率	工人生产额
1913	2·523·0	100·0	5621·4	100·0	100·0
1916	2·926·0	114·7	6813·4	121·5	106·0
1917	3·024·3	118·5	4344·1	77·3	65·2
1918	2·486·0	97·4	1447·7	34·5	35·5



1919	2·035.3	79·8	1447·7	25·8	32·3
1921	1·306.7	51·2	1161·7	20·7	40·7

商业方面，苏俄的共产政府本来不许有个人商业的，所以苏俄内地市场生产品的交易额，一九二一年，由战前的四十七亿卢布减至六亿卢布，加以禁用货币，一切实已回复以物换物的原始状态。至于国营分配事业的结果，则国家为供给一般市民粮食起见，不能不向农民强制征收其生产品，而农民怨声载道，遂为势所必至。我们且看下列两表所表示出来的运输货物数量与国外贸易数额，便可明了共产制度下的商业，凋敝到如何地步了

运输数量表（同前表）

年份	运货车辆数	百分率	运货数（百万吨）	百分率
1913	33·000	100·0	156·9	100·0
1920~21			34·8	23·2
1921~22	9·939	30·1	38·0	24·2

国外贸易数额表（同前表）

年份	输入	百分率	输出	百分率	入超	出超
	百万卢布	百万卢布				
1913	1·374	100·0	1·520	100·0		146
1920~21	201	14·6	10	0·7	191	

农工商各业的凋敝崩坏，既如上述，当然要影响到社会的金融和国家的财政，其结果则为卢布的跌价与纸币的充斥。原来共产党的理想，认定货物的交易不必有赖于货币，以为纸币的跌价正可以促成废止货币的实现。但是国家财政，岁入与岁出不能平衡时势不能无所弥补，只有增发纸币，而货币何尝能够废止？于是苏俄立国后最初几年间，只见纸币发行额之激增，其骇人之数额有如左表：（见世界室主人之苏俄评论）



年度	纸币发行额
	百万卢布
1914	1 · 317
1915	2 · 670
1916	3 · 480
1917	16 · 300
1918	33 · 500
1919	164 · 200
1920	934 · 600
1921	16 · 575 · 300
1922	1 · 976 · 900 · 000
1923	176 · 505 · 500 · 000

苏俄初期产业的崩坏，完全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所造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代的苏俄经济政策，其实与其他各国在欧战期间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大异，为何结果不同？

因为：（一）各国受战祸只有四年，而俄国则有七年（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还有内战。）牺牲当然更大；（二）俄国战前工业并不发达，输出原料品，输入制造品，战争期内国外贸易等于停止，国内工业又因为运输燃料原料的缺乏和工人生产力的降低，大为减色，以致城市的工业品不足以交换农村的粮食，而农人收获的谷物，遂为政府强制征发，以分配于军队和城市的居民，农人自有所不愿；（三）各国政府的管理大工厂，一等战事停滞即行发还，而苏俄政府不愿如此；各国政府总想限制纸币的滥发，而苏俄政府则颇想借纸币跌价而使有产阶级的资产化为乌有；各国征发粮食，权在政府，立意公允，而苏俄征发之权属于贫农，其目的



在使富农不能保有其收获。综此三因，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后，自然工业农业相继崩坏，人民生活大感不安，不但农民怨嗟，兵士工人也都为了没有食物燃料，大家愤懑。结果，乃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彼得格勒工厂的罢工，莫斯科的兵士也表同情，而终于三月间有克朗斯太军队的叛变。

列宁到底是苏俄革命的英杰，不失为一个勇于自承己过的有作为者，他知道战时共产主义原不过是应急之策，既然发见了农民和一般人民的反感，不能不另定方针，于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者，乃以列宁之领导而通过于一九二一年三月间的共产党第十次大会，新经济政策之主要点，即在废止征发谷物制度，而代人农税，换言之，农民除了以其一小部分之收获纳税外，其余剩之谷物可以自由销售；因此，耕地面积加增，农产随之丰富。城市居民既须以制造品与农民交易谷物，金钱买卖的商行为当然为国家所承认而不复加以禁止，货币制度也就不能不加一番整理。

同时苏俄政府更把小工业交还原主，中等工业租给人民，而大工业也由国家按其种类，自设托拉斯，许其自治，并酌定其中一部分得分外人投资经营，所以工业逐渐可有起色。此外苏俄对外关系也开始慢慢恢复，一九二一年三月，俄英商约和俄土商约都签订了，五月间俄德条约签订了，七月间俄匈交还俘虏的条约签订了，九月二日和挪威订约了，十二月六日和意大利订商约了，凡此种种，可以表示列宁颁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渴想恢复国际间的贸易，使其本国人民经济状态得以复苏。总之，苏俄的产业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是一个时代，以后另是一个时代，而其关键全在新经济政策之实施；换言之，即在毅然改变战时共产主义



的政策，而逐渐地恢复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和私人事业罢了。我们且看采用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经济的回复，究竟有怎样的成绩。

第一俄国的国富潜力，首在农业，而农民又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故先说农业。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之致命伤，在于没收土地后强制征发农产物。新经济政策既然承认农民对于其收获之权利，政府除征收农产之一部为租税外，其余部分农民得自由处置，则一般农民自然乐于耕种，耕作面积之增加，为意中之举。试观下列苏俄中央统计局之历年耕作面积比较表，和 S.N.Prokopovicz 教授所根据的耕地面积百分率表，都可明了远年来耕作面积已逐渐恢复战前的数量了。

(甲) 耕作面积比较表

年分	面积（俄亩）
1913（战前）	106·823·000
1924	86·820·000
1925	92·980·000
1926	98·563·000
1927	102·853·000

(乙) 耕地面积百分率表

年分	百分率
1913（战前）	100
1923	70·8
1924	77·6
1925	83·2
1926	87·9

耕作面积已增加，农业机械的需要亦随之而省加，不论国内制造的或国外输入的，都有恢复战前数量的倾向，试观下表：



农业机器价值表（按战前价格计算单位百万卢布）

年份	自制者	输入者	合计
1913	67	49	116
1925~26	68	52	120

更就农产数量一方面说，也有恢复战前状态的趋势，兹先根据英国商务调查公司的调查，约略比较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一三年的重要谷类产额如下表：

年份	1913 (每百万吨)	1925 (每百万吨)
小麦	21·0	18·0
裸麦	23·0	20·5
大麦	11·0	6·0
燕麦	14·5	10·0
玉蜀黍	1·5	4·5

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 B.E.SKVIRSKY 的报告，试以一九二三—二四年度之农产额为一〇〇，计算以后诸年的指数列为左面两表，尤可见近年农业发达的速率至为可惊。

(甲) 农产全体产额表

年份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农产				
田产	100	98·3	131·3	142·0
内谷产	100	91·2	130·8	142·7
工业原料用产	100	113·6	176·2	165·7
畜产	100	110·1	119·2	125·0
年份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农产				
田产	100	99·1	135·4	159·0
内谷产	100	68·7	95·4	139·8



工业原料用产	100	168·8	259·6	243·9
畜产	100	163·1	143·9	160·9

我们再看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农业的经营是用何种方法。原来苏俄虽收土地为国有，而大部分农田面积和生产工具都属于农民，此即所谓私营农田。至公营农田有两种：一为苏维埃农田，由政府所经营；一为合营农田，用合作方法经营，总计起来，仅占甚小部分。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统计，就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农产总额与可供销售额分析私营，国营，合营三种而比较其百分率，如下表：

农产额

种类	总产额	可供销售额
私营	97·7	94·9
国营	1·5	4·0
合营	0·8	0·9
总计	100	100

第二，且说工业。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最显著的成绩是工业产率的增进。至于生产方法，则大半恃乎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托辣斯，他们乃是各个生产单位的工厂为了共同目的组织起来，负经营营理的责任，由政府代表主持；有以一地方或一分邦为范围的，有以全联邦为范围的，而国内工业产品要无不集中于种种托辣斯之手。各托辣斯的活动，都以国家经济机关的计划为根据，又受国家银行的资助，但既为自治组织，则原料不足，可以自由买入，制造之品，可以自由卖出，营业以本身盈亏为前提，产额遂因之而增进。当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度（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生产额较上年度约增百分之四十六，第二年度又较第一年度约增百分之四十四，虽还不能恢复战前的生产率，但较产额最低之一九二〇年，实已增至一倍以上。试以最近数年各重要工业的产额，计算对于



战前一九一三年，产额的百分率，有几种实已超过原额，而大都总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观下表即可明了。

年度	1924~25	1925~26	1926~2
工业品			
煤	55·3	86·8	105·2
铁矿石	23·8	38·1	54·5
煤油	76·4	90·2	109·7
铸铁	31·0	55·5	70·5
钢块	43·8	69·3	77·5
棉织品	66·5	89·1	105·4
轻油	75·5	86·4	94·6
盐	57·2	73·8	102·0
火柴	85·8	160·6	110·9
纸烟	102·0	133·6	169·9
砂糖	32·2	76·4	74·7

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各大工业平均每年较前一年进步之百分率如下表：

年度	进步之百分率
1924~25	154·6
1925~26	142·8
1926~27	114·5

至于就工业品生产额的总数而论，近数年来也有显著的进步，试以战前价格为标准，如下表（单位百万卢布）

年度	产额总值
1923~24	3·414
1924~25	5·039



1925~26	6·923
1926~27	7·855

苏俄近年来工业之进步，更可就电气事业之发达一点上加以证明。试单将近年国家预算上支出重要电气事业建设费和修缮费，有如下表：

年度	电气事业费 (卢布)
1924~24	50·800·000
1924~25	51·600·000
1925~26	66·600·000
1926~27	95·000·000
总计	264·000·000

工业既然进步，工人数目，当然也随之而逐年增加。据该局的报告，大工业中，以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的工人数目为根据，比较每年工人数目对于前一年之百分率，如下表：

年度	百分率
1923~24	100
1924~25	117·1
1925~26	129·9
1926~27	106·5

但是，苏俄工业虽然进步，工人数目虽然增加，一九二六~二七年大工业的工人数目虽然已约有二百五十八万人之多，可是因为原料不足，设备不良，资本不敷，工业的发展不能如所预期，故多数国营工场，都感工人过多的痛苦，失业问题当然不为解决。据英国商务调查公司的报告，一九二六年三月间工会会员之失业者



有一·一八二·五〇〇人，非工会会员之失业者也相彷彿，假定苏俄人口除了农民以外有一千三四百万人（全人口约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万人），而失业工人达二百三十余万人，是已约占百分之十六，不可谓不多。此外，工人工作的效率，也颇见低减，往往逢星期日或例假日的次日，工人到厂者不过十分之二。惟其如此，所以工人数目的增加，不能认为工业发展的惟一左证。不过无论如何，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工业资本的增加，产额的增加，工人的增加，已表现着苏俄工业确有转机的趋势了。

第三，再说商业方面。新经济政策之特点，在于一方面由政府管理输出入贸易，一方面于一定范围之内，容许私人与外国资本参与。因为苏俄货品缺乏，不能不由政府设法限制外货之流入，使对外贸易，常常维持其出超之地位，间接得以维持对外之币价。同时以事势所迫，不能不于国营以外，容许私人营业，而对于私人资本又往往许以种种利权，借以吸收外资。至于国内贸易，除了国营以外，也允许私人营业；不过在立法上行政上加以种种限制例如课税较重，原料索价较昂，所以私人营业交易虽逐渐增加，而比到国营和合作经营的事业，则逐年有落后的趋势。试观下表，便可明了。

国内贸易百分率比较表

年度	国营	合作	两项合计	私营
1923~24	31·0	28·2	59·2	40·8
1924~25	35·5	37·5	73·0	27·0
1925~26	35·0	41·0	76·0	24·0
1927~28	34·0	44·0	78·0	22·0

苏俄的对外贸易，也逐渐进步，不过没有和国内贸易同样进步得快，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现在贸易额还只有达战前的半数，见下表：



历年对外贸易额比较表（以美金计算）

年度	对外贸易总额（元）
1913	1 • 490 • 495 • 000
1922~23	199 • 300 • 000
1923~24	484 • 910 • 000
1924~25	666 • 925 • 000
1925~26	733 • 130 • 400

据最近十三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所载，自战前起至一九二五年止，苏俄历年来的对外贸易额，更可见新经济政策颁行前后对外贸易情形的转变。兹以一九一三年的物价为标准，列表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年度	输入	输出	总计
1909~13	1 • 139 • 7	1 • 501 • 0	2 • 640 • 7
1914	1 • 098 • 0	956 • 1	2 • 054 • 1
1915	1 • 138 • 6	401 • 8	1 • 540 • 4
1916	1 • 716 • 5	476 • 4	2 • 192 • 9
1917	1 • 965 • 6	464 • 0	2 • 429 • 8
1920	29 • 0	1 • 5	30 • 5
1921	210 • 0	20 • 2	230 • 2
1922	269 • 8	81 • 6	351 • 4
1922~23	147 • 9	133 • 3	381 • 2
1923~24	206 • 8	332 • 9	439 • 7
1924~25	356 • 1	320 • 2	676 • 3

第四，国家财政和金融。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以为货币可以废止，故对于纸币的充斥和跌价，毫不引以为忧，而且年年滥发纸币，漫无限制。一九一四年的纸币发行额为一·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卢布，而一九二〇年以后，则为数大可惊人，有如左表：



年份	百万卢布
1920	934 · 600
1921	16 · 375 · 300
1922	1 · 976 · 900 · 000
1923	176 · 505 · 500 · 000

我们中国人受卢布的损失，不可谓不巨，观右表，当然可以明白，卢布所以狂跌的原因了。苏俄政府既于一九二一年颁行新经济政策，承认商业，恢复银行，一九二二年遂不得不决计整理金融和财政。其入手方法，为设立国家银行，掌理发行纸币，其单位“采尔逢纳”（Tchervonetz）等于十卢布。新纸币发行额中，四分之一须以现金或外国货币为准备，其余以短期证券为准备。银行供给政府短期借款时，得发行纸币，但须准备二分之一之现金。此外尚有人民财政委员会所发的库券，以卢布为单位，和银币铜币。采尔逢纳既有可靠的准备，信用当然大好，不能和从前滥发的卢布票同日而语了。所以一九二三年一月，采尔逢纳仅占全国通币百分之三；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则已占百分之八十，而苏俄旧卢布票逐渐绝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的调查，采尔逢纳的发行额为七八一·三六三·六〇〇卢布，其中以现金为准备的有二一六·一三一卢布，以外币为准备的有四八·八七四·七〇〇卢布。

苏俄国家银行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恢复，到一九二七年，资本总额达二千五百万采尔逢纳，公积金达五千三百万卢布。银行为金融枢纽，也就是一切工商界的血脉，今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将有关金融业贷借各点，分列数表于左，以明苏俄工商业逐渐恢复的趋势。

（甲）国家银行存款总数表



年份	百万卢布
1913	1·049·3
1922~23	73·6
1927	1·303·0

(乙) 全国重要金融机关资产存款放款约数表 (单位: 百万卢布)

年份	资产额	存款额	放款额
1912. 10. 1	156·0	227·0	538·0
1926. 10. 1	815·0		3·400·0
1927. 9	1·064·0	1·500·0	4·844·0

(丙) 全国储蓄银行营业状况表

年份	银行数	存款户数	存款总额
1913	7·074	7·459·001	1·403
1922	885·1	19·000	1
1927. 1. 1	14·819	1·804·000	146

讲到财政, 以前苏俄国家岁出入的不平衡往往以发行纸币为补充, 政府力谋减少其数额, 故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党开第十一次大会时, 决议纸币补充预算之短欠以一万八千万卢布为限, 至一九二四~二五年的预算, 已经无此项目。同时苏俄联邦的预算, 则逐年膨胀如下表: (单位: 百万卢布)

年度	预算总额
1913	3·605
1923~24	2·298
1924~25	2·931
1925~26	4·039
1926~27	5·009

五 苏俄共产党内部的分裂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特罗茨基被摈斥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外，十二月一日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议决，开除特罗茨基，徐诺维夫的党籍，并把特罗茨基，卡米诺夫，赖可夫斯基等约百名的人物一概放逐，这是可以算得苏俄共产党长期内讧的结束，虽则以后未必全无问题，而目前似已告一段落。大概言之，苏俄共产党的专政，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至列宁病前为列宁独断时期；第二，自一九二三年列宁病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开第十四次大会后，徐诺维夫等反对斯达林以前，为斯达林，徐诺维夫，卡米诺夫三人结合时期；第三，自一九二六年初，新反对派成立，徐诺维夫卡米诺夫等也反对干部派，并与特罗茨基携手，至一九二七年底大家尽被开除党籍为止，为各反对派团结时期；第四，自一九二七年底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决议开除反对派重要领袖党籍以后。当为斯达林大权独揽时期。我们从这四个时期的划分里，就可以看出苏俄共产党内部分裂的转变痕迹。

共产党之在苏俄，自以为团结最坚信仰惟一的团体，何以今有内讧呢？简单言之，起初彼此或尚为政见不同而辩难，继则变为感情意见的争执，终于大家借政策为口实而互攫势力。所以，如徐诺维夫、卡米诺夫辈，昔日可以赞助斯达林，攻击特罗茨基，今日可以联络特罗茨基，反对斯达林，翻云覆雨，恬不为怪了。现在姑且把他们内讧的历史约略叙述于后。

苏俄共产党内部之反干部运动，自一九一七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即已萌芽。一九一八年三月共产党第七次大会讨论批准对德和约时，特罗茨基，布哈林等提



出异议，指为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反对派气焰渐高，一时有“左翼共产党”的徽号，但对德签订和约，终究为多数所通过，反干部的运动，因此还振作不起。

此后因为连年内战，加以外国的出兵干涉，援助白党，共产党为协力对外计，分裂的痕迹自然消沉了多时。可是几年战争的结果，他们的党和政治组织，渐渐有以军事为基础的趋势，命令可以决定党内生活的命运，流弊所及，党内的干部人物渐渐的离开了民众，而形成一种官僚阶级。于是一九二〇年有新反对派出现，起而攻击干部派的官僚化，就是所谓“劳动者反对派”。他们这一派，是以前人民委员会农动工商委员叙利亚尼可夫（A.Shliapnjkov），现任苏俄驻墨大使柯伦泰（Aleksandra Kollontai）为领袖。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共产党开第十次会议时，提出攻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案，说中央委员会不能清党，不能与官僚主义奋斗，不能使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指导机关工人化。叙利亚尼可夫的演说词，并且明白指出他们的党是正在哪里变化，中央委员会不但不能从无产阶级吸收新党员，就连保持原来固有的党员也不能做到。

到了一九二一年，列宁取消所谓“战时共产主义”，颁布新经济政策，苏俄的经济界固然有了来苏之望，可是一部分劳动者共产党人却大不以为然。列宁认为这种“左翼幼稚行动”应该加以纠正，在共产党第十次大会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实行，竭力防阻反对派的小组发表一切宣言，反对派主张国营工业的管理权应移转于工团之手，因此更引起干部派的清党运动，几乎四分之一党员顿被开除党籍，在排出党外的十五万人之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工人们，而反对派也居其一部分。不过这种压迫政策并不能杜绝反对派的活动，他们依然有小组织，有秘密的通信机



关，中央委员叙利亚尼可夫就是领袖之一，列宁虽想摈他于中央委员会之外而事实上没有成功。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间，“劳动者反对派”以二十四人的签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公然指斥苏俄共产党的领袖压迫无产阶级，禁止他们在党内发言，命令他们选举领袖所示意的人，而置党于不顾。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可以知道新经济政策初行的时候，苏俄共产党内部是分裂争论得很烈的。后来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成绩良好，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些进步了，群众的生活机能有些活气了，大家觉得再要回复单纯的共产主义当无异于发疯，于是从前竭力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人也就不得不掩旗息鼓，而反干部派的运动乃较前锐减。

一九二三年，苏俄经济界发见了一种危机，大企业的工厂都关了门，失业的人陡然加增，工人罢工的风潮继续不断。在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因新经济政策承认他们的地位而逐渐增厚势力，以致从前有七十万党员的一个党，那时只剩三十五万一千人，而其中只有五万四千人是工人。党内的反干部运动当然消灭了，沉寂了，可是他们的领袖倒也自惊起来了。徐诺维夫在革命第六周年纪念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说明党内这种沉寂的现象是要不得的，于是中央委员会允许公开讨论党内的问题，而各方面讨论的文字也就风起云涌的发表出来，其范围则超出乎中央委员会所许可者之外。尤奇者，那时最强烈的反对派领袖就是特罗茨基，他著一篇文字，题为“新进路”，责备所以造成党内这种现象的是握权领袖们之过。他以为官僚主义不是从下级来的，不是从真正工人群众来的，却是从上级产生的，从腐化的中央委员会养成的。特罗茨基一方为中央委员之一，一方持此理论以唤起一般军队和青年学生，共同努力于反干部运动。起初公开讨论的时候，干部派还不以为意，到了特罗茨基，赖迭克等做了领袖，显然有反对党的行动，他们干



部派就开始对特罗茨基加以剧烈的攻击了。那一年的秋季和一九二四年的一月间，全俄嚣然争论，莫衷一是，直至一九二四年列宁病歿以后，大家视线转移，这个问题方告暂息。

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反对派又有生力军增加出来，声势格外浩大了，那年十二月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议席上，对于先前反干部运动的处置，颇有争议。干部中人因为态度不同，自己分裂起来了，如徐诺维夫，卡米诺夫，苏可立可夫，克鲁蒲斯卡亚夫人等也因为攻击干部处置特罗茨基方法的不适当，自己变成新反对派了。他们主张将特罗茨基严加处罚，但斯达林，布哈林等不予赞同，于是他们指挥着列宁格纳的党务机关，去排斥斯达林等，因目的不得达，乃更进而攻击干部派的政策。他们以为干部派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造成私有财产增加的机会，增加小富农的势力，不能救济乡村一般的贫穷。他们又以为不鼓起全世界普遍的社会革命，苏俄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从建造成功，而干部派的政策是逐渐远离世界革命的途径的。他们更以为党中，公开讨论和党员发表意见是应该容许的，而干部派往往以多数压迫少数，并且指摘少数派的讨论为违背党纪，以致共产党内不能实现民主化。这些都是新反对派所持以攻击中央委员会的理由。也就是徐诺维夫，卡米诺夫等所以与斯达林绝缘而转与特罗茨基握手的理由。

以上所述的各种反对派，本来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也许他们相互间的异点比较他们与干部派间的异点为多，但是他们因为反干部的目标相同，就结合一致，等到特罗茨基加入，全党全国都受了很深刻的震动。他们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发表宣言，力诋干部派的行动，又组织了许多秘密会议，散布秘密文件，仿佛在俄皇专



制之下的秘密活动。同时干部派也到处派遣密探，参加各种会议，秘密报告其结果，相持至一九二七年夏，反对派的领袖们大为活动。五月九日，徐诺维夫在一个莫斯科非共产党员大会中，作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的演说；七月间斯密露亚被迫离莫斯科时，群众欢迎，作反干部的示威运动，特罗茨基也有取攻势的演说。

同时，苏俄的国际地位非常紧张。英国与苏俄绝交；苏俄驻波兰大使被刺；苏俄境内有许多地方被攻，战云密布。特罗茨基就屡著论文，责问党的领袖们有否捍卫国家的能力，并且竭力主张效法克勒蒙苏，在法国危急的时候，起而推翻无用的政府。干部派的对付方法，除使用压力外，开了许多党内的会议，利用这些会议，大家起来要求排斥特罗茨基和徐诺维夫于中央委员会以外。可是愈用压迫威吓的方法，反对派愈形团结，几乎与干部派势不两立了，于是列宁的夫人克鲁蒲斯卡亚鉴于党将由分裂而趋于危亡，毅然脱离了反对派，但是还不能息争。双方既不能互让调和，遂逐渐由政见不同之争，变而为意气，感情，势力之争，干部派觉得非将反对派扫除净尽不可。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把特罗茨基和徐诺维夫开除党籍，十二月间把反干部派的一百左右主要人物尽数放逐，都是苏俄共党十年内讧自然的结果，早可预料其必有这一天的，不过不能断定哪一派是胜利者罢了。

我们大略看了苏俄共产党内部分裂的历史，可以明白一点，就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起，苏俄共产党自命为信仰惟一和团结最坚的团体，所以绝对禁忌党中分派，殊不知他们所迷信的共产主义，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呢？抑是列宁主义呢？他们究竟相信马克思，承认经济落后的俄国很难建设完全的社



会主义国家呢？还是信仰列宁，承认只要无产阶级取到政权就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呢？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他们究竟信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变相的国家社会主义呢？还是仍旧信仰纯粹的共产主义呢？他们究竟相信列宁是要优容农民的势力呢？还是要限制农民的优势呢？他们究竟相信俄国应该先尽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呢？还是相信俄国应该先帮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呢？……诸如此类，他们的信仰还不曾到得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共信不立，难怪他们互信不生，而至于自相分裂自相争轧了。我们现在可把他们的分裂为前车之鉴，在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立场上，赶紧建筑起共信来，方才可以永久有坚固的团结。回想去年我们宁汉对峙的痛史，也就是为了共信不立所致，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呵！

六、结论——共产党专政所持理论的批评

苏俄共产党专政，已经满十年了；十年中间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他们共产党内部的纷争，前几节都已大概说过。最后，我们要揭出：这十年来俄国的政局究竟是一种什么政局？共产党人说，俄国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却知道实际上是共产党专政，是共产党内的一派自命为正统派的专政。至于何以他们要专政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论，姑且简略说明如左：

他们所持理论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国家，不是伦理观念的具体化，也不是法律的普遍有效制度的实现，也不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一种权力，却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是握有权力的掠夺阶级用以压迫被掠夺者阶级而维持生产的外表条件的一种政治组织。由此推想，他们以为国家最后就是一种压迫的特殊势力，纵使民主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国家只包含着



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总是不能代表全社会的。他们以为已往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换了一个少数人的新阶级来统治，仍旧有多数人被压迫着，只有无产阶级的胜利才可以解放全人类，因为无产阶级以下没有什么阶级再待解放了。经济方面，他们以为必由国家用社会的名义掌握了生产机关，然后国家可以代表全社会，政府不必管理人而只须管理事务和生产方法便了。但是，他们想，无产阶级推翻了有产阶级的政府，夺取了军权政权。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由工人们掌握并保有国家的政权，用以为压迫有产阶级的权力。这些便是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

我们要批评这种理论，先要认清楚：（一）国家是否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二）要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否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三）由无产阶级专政去压迫资产阶级。是否足以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

第一点，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群人民用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一个团体，并不仅是一个统治机关，尤其不是一个阶级统治机关。故国家乃是在这个国家区域以内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整个的团体组织，无论何人不得私有的，其统治权当然属于人民之全体，而不能为某一阶级所独有的。

第二点，我们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理而非生理，故阶级斗争绝不是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惟一方法，就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尔，也都不主张达到共产目的的途径一定要到处一样。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说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是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



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政，便用不着”。我们尽可以运用三民主义中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方法，根本融化劳资两种阶级的存在，合而为一，以造成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何必一定要鼓动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挑衅呢？

第三点，社会主义的社会，乃是社会上各阶级利益可以均等发展的一个社会。换言之，在这种社会里，要土地资本可以由各阶级共有，生产力的组织可以由各阶级共治，生产品的分配可以由各阶级共享。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果要造成这种社会，当然要有能够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府，而不是某一阶级专政的政府所能做到的。故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其一切设施，至多不过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决不顾及全民的利益，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共产党原不过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方面欺骗无产阶级民众，使得误信他们可以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民众的势力，作为他们自己少数人攫取政权的阶梯。回看已往十年苏俄的历史，究竟是不是真的无产阶级专政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实行了共产主义，提高了劳工生活呢？奈何中国还有拜俄迷的妄人，失却了自信力，专想叫中国追随俄国去蹈他覆辙呢？

全书完

